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8月15日第17期 总第26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61 期

## 北师大二附中文革专辑（上）

### 【专稿】

季 烨 北师大二附中 1966 年“八二五”惨案概述（代序）

#### 第一章 曹滨海，反抗“血统论”的勇者

1. 北师大二附中文革纪事
2. 疯狂的时代 血的记忆（王骥）
3. “还原与反思”座谈会记录辑要
4. “还原与反思”座谈会后续

### 【附录】

1. 我的同学曹滨海（AI 园家）
2. 曹滨海最后的身影
3. 陈函实给班里一位同学的信

#### 第二章 樊西曼，众目睽睽下的虐杀

### 【附录】

1. 我所见到的“八二五”（AI 园家）
2. 二附中“八二五”事件（杨大同）

#### 第三章 姜书记的最后一刻

### 【附录】

1. 姜培良阶级斗争教育之果（张新）
2. 对文科班思想工作消极面的一点粗浅看法
3. 我对姜培良书记的认识

### 【本刊声明】

## 【专稿】



作者简介：

1948 年生于济南。1961--1964 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学生，1964--1968 北京师大二附中文科班学生，1968--1974 北大荒农工军垦战士、教师，1974--1978 北京中学教师，1978--1982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77 级），1982--2007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2007 年退休。著有：文革之初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色暴力”——姜培良之死与“仇恨教育”（《记忆》121 期）等文。

## 北师大二附中文革“八二五”惨案概述

季 烨

1966 年 8 月 25 日，北京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再次闯入高二 1 班同学曹滨海家“破四旧”，还要跟他“辩论对联”，揪他家的“黑线——曹滨海的母亲，时任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的樊西曼。此前“对联”肆虐，曹滨海态度鲜明地反对对联，写大字报、贴标语、上台辩论；而前一天，其所在高二 1 班红卫兵领导人陈涵实带人闯入曹滨海家，侮辱性地审讯了曹滨海的母亲。25 日，红卫兵第二次闯进其家，曹滨海激愤抗争，挥刀砍伤了陈涵实。

曹滨海此举引发了二附中红卫兵的疯狂报复，他们将樊西曼揪到二附中，在校园乒乓球的砖台上，将其活活打死！

当天，二附中红卫兵宣布，第二天要在全北京市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并打死曹滨海及全体劳改队成员。经周恩来总理派人反复做工作，此会才没有召开，红卫兵转而在校内进行更大范围的人身迫害。他们将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青年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活活打死。同时对“劳改队”全体成员、全校教师、同学进行疯狂的殴打虐待。其迫害范围之广、手段之残暴，骇人听闻。

北师大二附中的“八二五”惨案对北京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防止阶级敌人进行阶级报复”，成为北京大兴和湖南道县等地虐杀“五类分子”乃至灭门的理由。

2016年2月份,在这一事件中被砍伤的陈涵实及其他当事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召开座谈会,回顾了曹滨海事件的详细经过,使这段痛史的得以厘清。会上,陈涵实等人表达了对受害人的深刻歉意、对本人当年行为的深刻反省。

“八二五”惨案是二附中师生痛彻心脾的记忆,多年来,大家写了一些文字,更多的是口述。我把它们收集在这里,分成六个部分。除署名文章外,其余各篇文字都是我多年来对二附中师生采访整理编辑或撰写的,基本完稿于2013年,后陆续增添零星新材料。在这六部分中,主干为我搜集的“八二五”事件经过材料;各章及报告全文后附加文章,或为我编辑或撰写的与主干有关的文章,或为二附中同学撰写的有关文章;既有补充内容,亦有深入一步的对暴行产生原因的探究(如第三部分《姜书记的最后一刻》、第四部分《靳正宇年轻的冤魂》后面的附文)。现一并辑于文后,供读者全面了解这一事件,并期望借《记忆》这一平台,将其永久保留,为后世所借鉴。

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当事人,尤其是当年的红卫兵领导,囿于各种原因,没能像陈涵实等人那样站出来说明事实,承认错误,向受害人道歉;尽管其中大部分人内心程度不等地存有悔恨之意。对此,我们只有等待。📖

(本调查报告及附文,除署名外,均为季烨编辑或撰写的。特此说明。)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歌:《三色帆布》

作词:王健、作曲:李一丁



三色帆,三色帆,三色帆。

我寻找你,我走近你,美丽的三色帆含着深情意。

我凝望你,我懂得你,美丽的三色帆,无言的期冀。

我寻找你,我走近你。我凝望你,我懂得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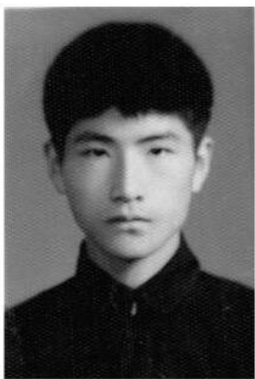
我珍惜你,我记得你,美丽的三色帆我青春之旅。

我珍惜你,我记得你,美丽的三色帆我青春之旅。

三色帆,三色帆,三色帆,三色帆,三色帆。

## 第一章 曹滨海，反抗“血统论”的勇者

### 一



曹滨海，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师大二附中高二1班学生。他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父亲文革前是某军事院校院长，母亲时为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父母均为高级干部。曹滨海生活在单亲家庭，母亲樊西曼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樊西曼抗战时参加革命，曾是声名显赫的新四军女政委。党校群众反映，樊西曼朴素和蔼，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她家孩子也非常有教养。曹滨海非常爱他的妈妈。

曹滨海上初中时身体不好，影响了学习。栗卫民同学曾经被安排帮他补习功课。后不得已留级。他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高中历史杜平老师至今对他有深刻印象：“曹滨海上课坐这边（指左前方），他爱提问题，爱动脑子。我挺喜欢他的。”他的独立思考，可能缘于所处环境吧，从小就涉及到政治层面，初中他与牛志民同班，关系很好，常给牛讲些党内斗争的故事；据曾接近他们的低年级L同学回忆，他对共产主义能否实现存有疑虑，他没有加入共青团。一般同学反映，他比我们大一岁，比我们聪明，爱思索，不爱说话，从不乱开玩笑。高和林同学说：“我与曹滨海从小就是同学，他很优秀。”朋友私下谈起，曹滨海形象气质突出，很早就有女孩子倾慕；对此，与曹滨海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二一直是同班同学的发小杨叶璇予以充分肯定。她对曹滨海的评价是：“曹是一个表面腼腆，内心刚强，坚持真理，难得的少年才俊！”

### 二

文革爆发，极左猖獗，特别是“血统论”对联骤起，红卫兵狂飙横扫校园。而曹滨海身为红五类却秉持正义，坚持理性，公开批评对联，写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上台

与狂热者辩论，成为二附中校园里最勇敢的反对派。

### 高二1班 于芳民：

818红卫兵受接见后，引发两大突发矛盾激化，一是红卫兵开始用武力进行大面积抄家和武力批斗；二是通过谭立夫事件开展血统论的灌输。当时真谈不上讨论，主导潮流是绝对如此。想想遇罗克的遭遇，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红色恐怖。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曹滨海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他当时写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时，是和我讨论过的。我也同意他的观点。但当真正署名时，我退缩了。主要是，毛主席刚接见完红卫兵，并明确支持红卫兵造反，理解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当时还是属胆小怕事，不敢和红卫兵公开对着干。结果，曹滨海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后，果然引起轩然大波。

### 高二1班 钟山

对曹滨海只有一面之缘，他当时赞成红旗的主要观点，曾来找梁平或是圆圆谈过，可惜（我）没有参与，只打了个照面，但对他的的大字报欣赏。

### 高三2班 陈天感：

虽然过去了50年，但曹滨海爬上架在学校食堂外的大梯子，撕去血统论对联的横幅“完全如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原横批是“基本如此”，二附中红卫兵改为“完全如此”），贴上“完全反动”的悲壮一幕，总是萦绕在脑海之中……敬佩他的特立独行的勇气！现在想起来他真的很了不起！

## 三

曹滨海由此招致红卫兵痛恨。有老师清楚记得，红卫兵领导人李××带着一群小红卫兵与曹滨海辩论，“那哪是辩论啊，是围攻啊，又是喊又是叫的，呼口号，还放鞭炮！”

此时有一个人起了特殊的作用——铁道部党校副校长何××。何二十年代参加革命，比樊西曼的资历还老。据说他们二人在工作中有矛盾。文革起，樊西曼被从四清工作队“揪回”本单位，接受审查。有说何××与樊西曼文革中分属不同组织，樊西曼人缘好，得到多数派的拥护。何通过他在二附中读书的子女与二附中红卫兵建立密切关系，并在二附中散布、尤其是向曹滨海同班红卫兵领导人陈涵实灌输樊西曼所谓“黑线人物”的信息；后来就发生了陈涵实带本班及初中红卫兵到曹滨海家造反、继而发生了曹滨海持刀反抗的事件。(详见《“曹滨海事件回顾与反思”座谈会记录辑要》及《座谈会后续》)

“八二五”事件前，二附中红卫兵就把何××夫妇保护起来。直至1966年秋，二附中劳改队都解散了，何××夫妇仍住在二附中小楼里。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告诉我，她们曾看见何××夫妇俩坐在红卫兵办公室外，就质问他：你不在你们单位搞文化大革命，你跑我们学校干嘛来了？何××回答：“是李wl叫我们来的。”李wl是二附中红卫兵头头之一，此时正当势，左得不可一世。接着，李wl还因为这两位红卫兵对何××态度不好训斥了她们。

带红卫兵到曹滨海家造反的，是本班红卫兵领导陈涵实。他也是革命干部出身，也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也被一般同学认为“比我们聪明”，在班里是老大哥形象。文革开始陈涵实成为班级红卫兵领导。有同学看到他在操场指挥全校红卫兵唱对联歌，慷慨激昂，气势冲天，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换了个人似的？

本次行动参加者多认为他们不是去抄家的，他们去是和曹滨海辩论对联，或者是去“破四旧”的。陈涵实承认，他去辩论对联，是心里认为樊西曼是黑帮，去“仗势欺人”。他们去曹滨海家，笔者命其名为“去造反”。

据在场者说，曹滨海挡在门口不让他们进。争吵中曹滨海说：“……我杀了你们！”结果有个女红卫兵史××就真去拿了把刀给他，激他，“你砍呀！”没想到曹滨海就真砍了，砍在陈涵实脑门和后脑，血流满身。在场红卫兵一拥而上，痛殴曹滨海，致其遍体鳞伤，警察来将曹滨海带走，红卫兵烧毁了曹家所有大小物件，接着就发生了北京师大二附

中“八二五”惨案。

**网友 teddybear-熊窝：**

你们学校的曹滨海和崇文区的李文波是当时仅有的两起对红色暴力的反抗。

**初三 TXR 同学：**

每当想起曹滨海，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保尔·柯察金》里的一段：当德国人扫荡村庄时，全村只有村东头的铁匠拿起枪，保卫他年轻的妻子……这段我到现在都能背呢。

在那个年月，人人胆战心惊，敢提刀抗争，誓死维护尊严人有几个？曹滨海面对无端闯进家门的人拿起了刀，这应该是值得歌颂的勇敢行为，自卫永远是正确的。

## 四

据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注，曹滨海被北京市公安局保护性拘留，最后无罪释放，定性为“激怒伤人”。听说他从监狱出来，知道他妈妈被打死就疯了。也有人说他在监狱里就得了精神病。

在曹滨海被公安局收押后，高二 1 同学就积极行动，以各种形式努力促进曹滨海无罪出狱。高二 3 刘绮菲同学说：记得文革后期，我们下乡前，曹滨海同班同学朱景龙贴过长大字报《为曹滨海平反》。

据说曹滨海从监狱里放出来后，先把分到他分到青岛四方机车制造厂，大概是让他躲开红卫兵报复。后来转回北京，据说分在丰台南口机车制造厂。后来厂里出事故，他被火车压死了。是自杀还是真事故？至今无人知晓，很多人猜是自杀，那几天，是他妈妈忌日前后。哪一年发生的？直至召开“回顾与反思”座谈会时，才由朱今天同学追究清楚：1985 年，他 37 岁时。其他的也问不出来了，他的家人太怕提起这段家破人亡的惨剧。

他后来想的是什么？



有红卫兵 XLL 同学告诉我，七十年代前期，她在东单潘××家门口看见过曹滨海。潘××当时正担任铁道部支左军宣队的领导。潘家女儿说：“这是个疯子，天天来找我爸要给他妈平反。”说起他母亲的单位，×同学一听，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曹滨海嘛，怪不得看着面熟呢！XLL 对潘家人说：“他们家特惨！”再到门口找，人已经走了。

除了母亲，他心中挂念的，应该是老师吧。


曹滨海高中班主任厉益森老师说“80年代初期，我在二附中当书记，曹滨海来看我。他没有提“八二五”的事，我也就没有提。他精神状态不太好，身体也非常衰弱的样子，瘦弱。对我说‘厉老师，我来看看您。’可能是在南口车辆厂的时候吧。”

这大概是二附中师生最后见到的曹滨海了。

## 五

听铁道部党校的朋友说，文革后，上级为樊西曼平反；党校为何××夫妇散布樊西曼材料导致其惨死事，给他们二人处分。虽然不重，总说明还是有天理良心啊。

领头去曹滨海家造反并被砍伤的陈涵实，从被送进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到学校参加活动，随后发生的“八二五”惨案给了他巨大的震动。他的家庭随后同样遭受了残酷的迫害，父亲被批斗侮辱以致精神失常，几个近亲都家破人亡。后来他一直搞技术工作。

大约在三年（2012）前，高二1班聚会，大家由某人不愿参加聚会，说到文革时事，他说：那时候“我混蛋！”了解他的人说：他能说出这话来，是因为他对文革，对其“造奴”经历，有了深切而清醒的认识。今天，通过“回顾与反思”座谈会，我们更清楚看到他对历史的清醒认识，他的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他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坦诚。但愿他的反思，能够成为当年犯了错误的红卫兵们的前导。

## 北京师大二附中文革纪事

朱今天

—

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化革命本来平淡无奇，从1966年6月初开始，与所有中学一样贴大字报，斗领导，斗老师，抄家“破四旧”，1966年8月25日那天之后，总算出了名声。

8月26日深夜政府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说：“……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你们到一起碰头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不安。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联络站。……”

25号那天，北京发生了两起反抗红卫兵的流血事件，都是在自己的家里。当时我们认为周总理提到的被刺伤的红卫兵叫陈涵实，坏蛋叫曹滨海，但是，敬爱的总理没有告诉人民在事件中有多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有一位是他曾任命的铁路局副局长。

曹滨海、陈涵实与我是高中同班，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论关系，我跟陈涵实更近，我们是同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曹滨海与陈涵实初中就是同班同学了，关系比我近。说远近，是因为文革之后，同学之间挥刀相向，情同敌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急？

曹滨海个子高高的，北方人的帅气，爱打篮球，爱思考，平时笑咪咪的，为人平和，我一直没注意到他与陈涵实一样，父辈都是高级干部，我也不知道他父母离异，子女都跟母亲过。同学之间分不出多少高低，并不刻意打听对方的家庭。

文革中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绝对如此）的出现使同学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以干部、军官子女为主体成立了，一些为了表达自己忠于革命的“非红五类”出身同学屈辱而无奈的加入了“红战友”这个外围组织，紧随红卫兵左右。曹滨海没有加入红卫兵，贴出了一张《绝对如此，绝对反动》的大字报，这是公开

向血统论，向红卫兵叫板！8月18日刚刚被伟大统帅认可的红卫兵正处于最狂热状态，绝不容忍挑衅！据一位老师的回忆，一帮红卫兵跟曹滨海辩论对联：“那哪是辩论呀，又吵吵又喊口号的，还放鞭炮！”

如何进一步压制曹滨海，在暗地里有了不为人知的操作。高三年级有个红卫兵头头，叫李瓦临，在红八月里经常去附近的铁道部党校活动，党校副校长何凤池属于受压制的一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他家有几个正值芳华的闺女，风闻李瓦临对其中一个格外有意，竟然就把何凤池夫妇偷偷接到师大二附中住下来，声称是保护受迫害的工农干部。当时的红卫兵之间还没有太多的制约，别的红卫兵头头也不好阻止。至少，何凤池的一个闺女是我们学校初中的红卫兵，每天在头目周围跑前跑后，也许是给了个情面吧。而何凤池的对立面，正是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时任铁道部党校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

8月23日，李瓦临找到陈涵实，让陈与何凤池夫妇谈谈。何凤池趁机陈列了樊西曼的“黑帮，黑线”，这正是陈涵实要追索的革命情怀，也是压制曹滨海气焰的底气。随后，陈涵实来到教室，见到曹滨海在和几个同学交谈，于是上前质问曹滨海反对对联的大字报，你来我往几句之后，陈拿出撒手锏，说：你妈是走资派。

曹滨海说：你说我可以，别说我妈。

陈涵实再接着的话的意思是：说你妈怎么了，你妈是走资派，还要抄你们家呢。

曹说：你敢去吗？

陈说：怎么不敢！

曹说：好，我在家等着你。

到此，陈涵实就走了。（以上是在场的于芳民同学的回忆）

第二天，也就是24号，陈涵实带着几个红卫兵去了曹家，曹滨海不在，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正好在家，陈就斗争了她几句，让她低头，反省。然后拿报纸写个条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她家墙上，然后就走了。

曹滨海知道陈涵实斗争了他母亲，很愤怒，在班里说：“有种的你们冲我来！”尤其

是点陈涵实名，让他去。

25号，对曹家的迫害继续进行。几个在现场的“红战友”后来回忆了事情经过：中午过后，班里的红卫兵史定平（女）带了几个同班的“红战友”先去了曹滨海家，借口是“造反”，“破四旧”，不然，去一个高干家抄家很不合时宜，当时，各单位的领导都被贴大字报，只要中央没定性，樊西曼还是党的高级干部，轮不到一个中学的红卫兵硬闯到家里来。

这次是曹滨海一个人在家，看来已经有鱼死网破的打算。对几个无关紧要的同学到来，他推搡了几下，也没认真，就容他们进了家。

开始只是互相理论了几句，有人说：“陈涵实还要来呢。”

曹滨海说：“他要来我就敢砍他！”，说着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撂在了桌上，一个同学赶紧把菜刀插到一堆书里。

随后，陈涵实带着几个初中红卫兵进了曹家。

陈、曹两人对峙了几句，有人说：“刚才曹滨海还说要砍你呢！”陈涵实说：“把刀给他，让他砍个试试！”

女红卫兵史定平拔出插在书里的菜刀递给曹滨海，说“你砍呀！”，周围一片喊声“你砍呀！”“你敢砍吗！”都认为他不敢砍。曹滨海抡起刀，一刀砍在陈涵实前额，陈涵实往前倒，后脑勺露出来，曹滨海又是一刀，大家都懵了。

随后的情景有一个在场的孩子回忆道：

曹滨海用刀砍红卫兵是因为他们班的红卫兵屡次去他家抄家，他气不过对抄家的红卫兵说“你们再来我砍了你们”，当时一个红卫兵拿来刀递到他面前说你砍啊，砍啊！被激怒的曹滨海举刀砍向一个红卫兵的头部，酿下大祸，立刻被抄家的红卫兵用带铁头的皮带疯狂抽打，大院里的孩子都聚在他们家楼下，听到皮带抽打的声音但看不见曹本人，也没有听到他的喊叫声。当这些红卫兵打的筋疲力尽后把他押送走，那一刻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当身着已被血染红的白衬衣的曹滨海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只眼睛被打得肿成拳头大的一

个包，昂头大笑高喊我无罪。

曹被公安局押走后，红卫兵把他们家的所有东西都从二楼的窗户扔到楼下，堆成两大堆放火烧了一夜，他们在那两堆火旁排队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唱了一夜！那一幕我就在现场，我10岁，但完全记得住那个白天和夜间的残酷。

这场悲剧随后在二附中校园引发了更大悲剧。

曹滨海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绝没有想到会给母亲招来杀身之祸！

有人回忆说 红卫兵头头李瓦临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极大的狂热，他派人把曹滨海母亲樊西曼从党校抓到二附中当天打死。

对樊西曼的虐杀是在一个室外的水泥乒乓球台上进行的，很多出身“不好”的学生，所有的教职工被强令到现场观看。

一些学生的回忆：

1. 樊西曼已经跪在水泥乒乓球台上，……红卫兵先是推搡，后是拳头，揪她的头发，打她的脸。女红卫兵王谦（高二）终于按捺不住她那高涨的革命激情，一脚将樊西曼踢下了乒乓球台，淹没在人群中。我已经看不见樊西曼的身影，只能看到有人抡着沾水的皮带不停地或者狠命地抽打，后来又有人挥舞着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棍，胳膊样粗细，像舂米一样的垂直往下夯。一下一下，一个人累了，马上有人争先恐后的接班。每夯一下，围观的同学们就齐声大喝一声：“好！”就像喊劳动号子一样。

……但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樊西曼说过一句话，或是呻吟一声。没有见她有丝毫的反抗，像是一块泥，又像是一块布，任人摆布。后来不知是谁说：“她在装死！反革命还在负隅顽抗！”又有人说：“给她泼水、撒盐！”于是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通往食堂的路，我看到了樊西曼，也许已经是尸体。她平趴在地上，那件深蓝色的上衣已经被打烂，露出了白色的、肿胀的皮肤，和上面条条鲜红的血痕。腿肿胀得像要把裤管撑破。有人从食堂端来一盆冷水泼在她身上，泥水一片，她一动不动；又有人接着往伤口上撒盐，她仍旧一动不动。夏日的阳光之下，众目睽睽呀！这一幕幕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

2. “在台上打人最凶的有个高三的红卫兵头头，叫李瓦临，那个时期，他总穿着一件褐色军装，扎着武装带，威风凛凛，我一直以为他家是革命军官，……”

3. “一朋友对我说，打樊西曼的时候，贾岩燕（高三1班学生，党员，红卫兵司令）用绳子抽，抽了几下樊西曼的衬衣就破了。刘炳琪（高三1班学生，教工劳改队队长）去拿的盐。”

4. “红卫兵轮流上前抽打。红卫兵们责令樊西曼下跪。樊坚决不跪。于是打得更厉害，打人的乒乓球台子东边就是食堂。红卫兵从食堂端来一盆盐，边打边向伤口上涂盐。用木棍。垒球棒。还有抄家抄来的，紫檀木棍，打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就没有停止过。樊西曼没有喊过一声求饶。直到最后由两名强壮的红卫兵用木棍。一直打个不停。”

5. “被红卫兵逼着下楼去看打樊西曼。眼看着樊衣裤被抽破，露出内衣来……”

……

以上的回忆都是现场的同学或被迫围观的教工，至今没有一个打人杀人者出来叙述、纠正或是反对。

开始打杀樊西曼的时候，红卫兵司令贾岩燕正带着一伙红卫兵在外面抄家，有受害者的子女明确的控诉说“北京师大二附中的一伙红卫兵暴徒近10人，（其中有李湘斌、刘诚、贾岩燕等）”参与了捆绑、打死36中女教师刘云的暴行（叶林明，叶林辉：北京1966年8·25惨案纪实）。贾岩燕们回到学校后又参与了打人。

那天我去北师大看大字报刚回来，在学校大门口里，看见一辆平板车往外拉，樊西曼已经死了，趴在车上，白衬衫都打碎了。

随后的暴行继续在教职工劳改队进行，党总支书记姜培良，语文教师靳正宇相继被打死。

一个学生回忆处于教工食堂的劳改队的情景：“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冲鼻而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湿漉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到一片人影，发出阵阵痛苦的低声呻吟，只见高云直挺挺地躺在那毫无声息，”

高云是副校长，会弹钢琴，曾被要求教劳改队唱《牛鬼蛇神歌》，红卫兵们在一旁说笑欣赏。有调查说高校长曾被脑门按了一排图钉，还被开水浇！文革中被害的女三中孙历



高云副校长

生老师家跟高校长很熟，孙老师的女儿于小红听高校长讲过他那段经历：“红八月时，高云被学生打得昏死，未经任何抢救，在假死状态下被送去了火葬场。当时北京大批死人，火葬场死人堆积。高云是八月二十几日下午送去火葬的，当天来不及烧。他被其他死人压着，堆放在露天地里。到了下半夜，他渐渐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等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天已露出一线晨曦。他赫然发现，他在火葬场焚尸炉前的空地上——他从火葬场爬了出来。”

厉益森是教导主任，算是第二号走资派，他说：“红卫兵毒打我，全身是伤。我的腰不好，他们就专门打腰，把我肾脏打坏了，当时我不知道。挨毒打后我渴得要命，他们不给水喝。他们往地上泼了很多水，我渴得不行就趴着喝地上的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把我肾脏打坏了，喝了的水排不掉，全身都肿了……”



教导主任厉益森

“8·25那天红卫兵让我们准备火葬钱，说明天把你们全打死，让我们自带12元火葬费。姜培良他们被打死后，我们继续挨打。”

有一篇回忆文章《伤害》讲到当时迫害教工的状况：

“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

“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住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门挨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被打者不知死活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

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成黑脸，极力侮辱和丑化……”

与红卫兵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的同学同时遭到了殴打、侮辱、罚跪，有些学生在宿舍的行李铺盖被丢出，不许在校居住。

这一天的打杀结束后，红卫兵领导钟南飞在大喇叭里宣布：我们要开十万人大会，把毛主席请来，在会上把曹滨海打死！

当晚，北京很多学校红卫兵队伍赶到二附中游行声援，操场上“人山人海全是人”，声讨敌人对红卫兵的“反革命阶级报复”。

大街上很多地方也有红卫兵大声宣讲：狗崽子翻天了！杀人啦！血债血偿……

中央制止了这次十万人大会，如果毛主席一千中央领导在现场眼看着曹滨海被打死会很尴尬。

大会入场券是蓝灰色的，已经发出了大部分，票的反面印着这么几条要求：1. 我们强烈要求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大会；2. 只允许红五类子女参加大会；3. ……。

“八二五”那天，北京崇文区榄杆市还发生了一起反抗红卫兵事件：市民李文波对被抄家、被殴打不满，用菜刀砍伤红卫兵，自己自杀不成，被红卫兵打死。这一天的两起反抗红卫兵事件被渲染成阶级敌人的血腥反扑，随后在北京掀起了更大的打死人狂潮，直至发展到北京郊区对“黑五类”及其子女的直接屠杀。

对北京“八二五”事件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中央的态度是放任。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打死了也就算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那一天上午，《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关于“造反精神”的三篇文章。和这些文章同版的，是《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大标题是《向革命的青少年



致敬》。”（王友琴：文革死难者——李文波）

同是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据《文革死难者》作者王友琴记述，我校红卫兵“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打他的人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后来，朱一家被扫地出门。朱一家三代人被拉到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被关在那里几个月。红卫兵用烧红的煤钩子烫朱家成年人的脚。小孩子也被审问。”

还有一个学生说：“他们在当天还打死了一对青年男女。据说是在当天由于拉着手在公园里散步。被他们抓到学校活活打死。到今天也不知道这对青年男女的姓名。”

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杀向社会，到底打死打伤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红卫兵头目出面澄清，他们当时对劳改队老师宣称打死的人有两位数。

## 二

1966年末，红卫兵被称为执行反动路线（可笑，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说变就变！）受到批判，曹滨海事件有了转机。

公安局专案组的王同志到学校调查此案，感觉有落实政策的意思。由他安排，在退休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家见到曹滨海的姐姐曹本珊，大妹妹曹滨平，具体还有谁在，我记不清了。见面的目的是为了曹滨海尽早出狱。

曹本珊当时在外地工作，穿军装。曹滨海的两个妹妹未成年，家已经没了，原来寄住在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家，很快武竞天被批判了，自身不保，又转到滕代远家。

随后没几天，由专案组安排，去了陶然亭附近半步桥第一看守所，这里原来习惯被称为第一监狱。

我提出曹滨海的刑事案件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继续关押，

狱方说：“我们不把他关起来，他还能活下来吗？早被打死了！”，

狱方还说“康生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

“曹滨海在这里面有的时候会表现出精神不正常，不是经常的，抢过别人的馒头”，

“没告诉他他妈妈死了”。

曹滨海比原来胖了，很短的平头，头发有些花白。应该是双方都关照好了，所以谁也没说什么，只是简单问候了他，他就谨慎的笑笑。表面看不出他精神有什么不正常，可是我心里很悲伤，他的母亲已因他惨死，他心里真的完全不知道吗？

总的印象，我觉得狱方没把他当“坏人”，事实上他也是按无罪释放的，没有判决书，应该是上边的直接决定。

我印象里和同班同学张哲江为曹滨海写了辩护材料，冷允法曾经是与曹滨海对立的红卫兵，批判红卫兵反动路线后，她真诚反思，积极参与了这个行动。

1968年9月，我们班几个同学去内蒙古插队，曹滨平到北京站来送我们。后来，就失去了联系。

曹滨海哪天出来的，二附中的人不知道，听说是他爸爸曹时生接出来的。曹时生从军队转业的时候是少将军衔，文革时是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也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早年与樊西曼离异另组家庭，夫人也参加过新四军。

### 三

几十年过去了，逝去的已经逝去，我们还活着。

曹滨海的两个妹妹当时年幼，遭受了家破人亡的打击和折磨，不知道受了怎样的煎熬，我们难以体会。我想问候她们，也想知道曹滨海生前的状况，想给曹滨海的墓地送上一束鲜花，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

班里的很多同学努力协助寻找曹滨海的妹妹们的联系线索。无果。

文科班的季烨同学对“八二五”事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从她的渠道那里，听说曹滨海的小妹妹樊小曼已经患抑郁症，而且她们家人不想与师大二附中的人有任何联系，伤得太深。

最终，一位铁道部的朋友提供了曹滨平的电话。我发了短信：……真不想打扰你，不想提起那个年代的残忍，但希望能知道你哥哥的墓地，去送上一束鲜花。

她没有回复。

我不想强人所难，所以没有给她直接拨电话。

我求助王友琴老师：“你就为了社会正义，承担这个打扰的罪名吧，毕竟你为了还原历史打了无数电话，问了无数不相识的人。”

王友琴老师打通了电话，得知：曹滨海 1985 年 8 月去世，那时候已经从青岛调到昌平机车车辆厂。那是他妈妈被打死的忌日的前几天，他精神恍惚，过铁道时被撞死了。38 岁。

曹滨海没有墓地，骨灰和他妈妈在一起，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据中华樊氏宗亲会对樊西曼的记载：

樊西曼（1915-1966），民国 25 年（1936 年）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 26 年 11 月经刘子厚介绍，到鄂豫皖边区加入人民抗日独立团（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前身）。曾任上海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是上海解放后，铁路局第一个女性副局长。1956 年 3 月～1966 年 8 月任中共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诬陷迫害，于 1966 年 8 月 25 日，惨遭毒打致死。1980 年 1 月 28 日中共铁道部党组作出《关于为樊西曼同志平反的决定》，予以平反昭雪。

2016 年 5 月 我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带着一束鲜花，在樊西曼、曹滨海的骨灰盒前默默地鞠了一躬，心里是代表着二附中的很多同学们。

骨灰盒是 1975 年安放的，那时曹滨海还健在，姓名改为樊东。

我们活着，他不在了。为了这个，我又去了南口，想了解他生前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他发生事故的过程。好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是，没有结果。

曹滨海生前应该没有恋爱或结婚经历，应该是集体户口。我去南口派出所查，85 年 8 月，该辖区亡故人名册没有曹滨海注销户口的记载。

不知道是错在哪儿了。

厂里，派出所都问我：这么多年了，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什么其他目的都没有，只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同学，同学们都关心他。

2016 年 2 月 25 日，由同学于海宁牵头，召开了“八二五”事件还原与反思座谈会，那天在曹家现场的我们班几个同学基本参加了，可贵的是陈涵实也参加了，并且坚决进行了反省和反思。于海宁也邀请了我 and 季烨。

座谈会后，季烨整理出《“八二五”事件的反思座谈会记录辑要》



陈定兰

朱今天

于海宁

尹平

陈涵实

季烨

郭玉摄

座谈会本来计划是在 2015 年年底进行，主要是看陈涵实的时间。陈涵实住在涿州，到北京来要乘火车，到了北京西站再倒几次车，谈完再回去很困难，很劳累。我要给他订宾馆，他拒绝了好意。只是说买不上火车票，只好拖过了春节。我们真的有些担心陈涵实改了主意。于海宁是个直性子，就打电话直接表示了担心。陈涵实的态度很明确，很坚决，

一定会来，就是要反思文革，警示后人。问他可不可以录音，录像，他说：没关系。

按说，陈涵实不出面反思道歉也说得过去，毕竟他挨了两刀。

作家胡发云对““八二五”事件的反思座谈会”的评价代表了很多人的赞许：“这是数十年来，我读过的以一个班级为单位对文革初期一个事件的最坦诚最真实的回忆，不论是当年的施虐者，受害者还是旁观者，都以最大的良知与勇气共同还原着当年的真相，包括自己心灵的真相。走出了面对历史面对自我的宝贵的一步。”

#### 四



何凤池，铁道部党校副校长，因在“八二五”事件中起背后鼓动作用在文革后期整受到纪律处分。其子女为他们进行了申诉。（左：何凤池）

贾岩燕（贾延岩），北师大二附中红卫兵“司令”，高三学生，1947年11月生，打人行凶时已满18岁。曾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右图：贾岩燕）



红卫兵二号人物李妮妮（高二3班学生，预备党员）后来多次回校参加同学聚会和校庆，就是从不谈当年的恶行。

刘炳琪，高三学生，教工劳改队队长，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积极策动“八二五”事件的红卫兵头头李瓦临后来参了军，清理“三种人”时铁道部党校追究到部队，对他进行了批斗，随后被复员，据称曾穷困潦倒，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打人凶狠的女红卫兵王谦后来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也受过批判。

打人凶狠的男红卫兵刘诚于2017年病故。

红卫兵领袖之一钟南飞在高中班微信群里表示过忏悔“文革中我也作了很多错事对不起老师同学，在运动中我罪孽深重，应当反思。虽至今没人追究，可负罪感还是有的，就算我良心未泯吧。请发表我这些话，教育大家，也包括我。其实，我与曹滨海私交很好，翻开血淋淋的旧事，听到他妹妹悲惨的一生，我心中很不平静……。”但是，他回避与同

学接触，闭口不谈当年的任何细节。

钟南飞说的对，“虽至今没人追究，”，剩下的只有良心。

我不知道在文革中虐杀别人的这些同学至今是否有公开的忏悔和道歉，一旦有，不管你在什么渠道、平台，我们都能听到。


孙维世的亲属说：“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沉默于人海中也没关系，学者米鹤都有篇文章说《反思文革不应先追究未成年人》，放心吧。

在二附中的校史展厅里没有文革的记载，在校庆50周年的《教师风采录》里没有靳正宇的名字，我曾在二附中的校刊上发表过《校园旧忆》，其中“文革惨剧”一节被要求删除了。理由是“向前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都是以同样的名义——“革命”。

注：季烨同学对北京师大二附中的“八二五”事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此文中有多处引用，细节请参看她的新浪博客（老酷禾子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2010wuyue>

《二附中文革8·25事件的补充材料》，《二附中“牛棚”点滴》等）。

## 疯狂的时代 血的记忆

王 骥

我从小爱打篮球，酷爱武术和拳击。1966年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初三，是初三（6）班的学生，正好赶上文革。因为住校，我认识同学比较多，和老师、食堂大师傅以及学校

工友的关系也都挺好。红卫兵的暴行劣迹，我知道一些，想忘也忘不了。有人说是我记性好，我说，听的、看的都是暴力和血色，能忘得了吗！

把我记住的一些事情，分条整理如下。

一，1966年8月1日，在贾延岩、李妮妮、李瓦临等人带领下，北京师大二附中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把校名改为“抗大军校”。红卫兵里有不少走读的同学，为了便于夜里提审、暴打和斗争老师、校领导，这些同学就都改住校了。8·18之后，文革运动在学校里很快就发展到斗同学、打同学，红卫兵提出新的战斗口号要“斗倒三胡一白”。这“三胡一白”都是高中的学生，三胡是胡雁奚、胡炳端和胡继光，一白是白兆和。这四个同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之间都没有个人来往，只不过对红卫兵骂人、打人、斗老师等行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天下午，红卫兵聚集在宿舍楼东边的水泥乒乓球台，准备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住在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胡继光刚从家里来到学校（胡继光也喜欢武术，平时我们在操场锻炼时相遇，聊得也是武术的技击方法，讨论最多的是三指钩和五指钩的不同用法），就在他经过乒乓球台时，一群高中女红卫兵冲了上去，把他围了起来，拉拉扯扯。胡继光虽然练过武术，出于对女生的尊重，他尽量避免身体接触，没有做任何反抗。这时又过来七八个男红卫兵，一同奋力将胡继光拉到了乒乓球台上，准备批斗。站在乒乓球台上的胡继光，身体直立、两肘合拢在胸前，两手握拳放在前额处保护着头部和眼睛。突然，他腾空一跃，用了一个类似“虎扑”的动作，体重一百六七十斤的他像一块大门板一样，砸向了乒乓球台下面正在高呼口号的红卫兵们，顿时砸倒了七八个人。这时，只见胡继光一个鲤鱼打挺，站立后迅速向操场和校门方向走去，红卫兵都惊呆了，不得不给他让出一条路，眼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在宿舍楼从窗户向下看，看的清清楚楚，还听见有几个高中女红卫兵高声喊着“流氓”、“反革命”……。其实当时许多人根本不怕红卫兵，不少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没有加入红卫兵，大部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也不想参加他们的“红战友”外围组织。只不过考虑到红卫兵支持者的威望，不做过多的反抗

罢了。我没见过红卫兵一对一打人的，都是一群红卫兵打一个人，从来都是以多打少。打老师和校领导时，不让老师抬头，必须低头看地面，他们害怕被打的老师认出他们的长相，抄家也是如此。如果被抄的人家有四、五口人，红卫兵往往要聚集二三十个人才敢去抄家，最少也得十几个人才敢出动。拿着尚方宝剑，也还是底气不足，因为他们在做的毕竟是邪恶的事情。

二，有一天夜里已经十点多了，突然红卫兵要斗争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于是，吩咐电工杨老师在宿舍楼和食堂之间的水泥兵乓球台附近，加了一个大灯泡。红卫兵把姜培良押到了水泥兵乓球台上，先是让他站着，后来又让他跪着，那皮带像雨点一样打在姜培良的身上。我在楼上宿舍的窗户看得非常清楚，有个红卫兵搬了一个课桌，又有红卫兵拿来了煤灰渣，姜培良被他们摁着跪在铺了煤灰渣的课桌上。现场指挥是李瓦临，带领喊口号的是张嘉佑，贾岩燕、李妮妮也都在场。后来有一个红卫兵一脚把桌子踹倒，姜培良从兵乓球台上的课桌头朝下摔到地上，顿时，头上的血就出来了。现场红卫兵一片欢呼，又把姜培良重新拉到了兵乓球台上，强迫他跪在课桌上，继续斗争和毒打，一直闹了大半夜。

三，八月份天很热，特别是下午烈日炎炎，就像一团火烤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亲眼看到红卫兵们把陆笃根老师从小食堂的劳改队里带出来，强迫她在烈日下跑步。陆笃根老师是个老太太，患有高血压病，跑了几圈，实在跑不动，红卫兵就拿皮带抽她，强迫她继续绕着操场跑，以此取乐。有个高中的女红卫兵还说：“就他妈这么个老东西，吴梅扎（一个女老师的名字）还管她叫妈妈老师。”说话间又是两皮带打在陆笃根老师的后背上。

四，丁德泗老师是我们班的英语教师，复员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一直打到四川后，在西南军区被部队挑选为飞行员，转入空军部队，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英文翻译，负责审问被俘虏的美军飞行员战俘。“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组织全校的老师开会，谈对红卫兵



运动的认识，会议的主持人是红战友头头张嘉佑，有几个初中的红卫兵也在现场。会上，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说话，怕说错一个字被抓进劳改队，或者在现场就遭到毒打。但是长时间保持沉默也不行，张嘉佑说，沉默就是对抗。在张嘉佑的反复催促下，老师们推举丁德泗老师和教初三（5）班俄语的金宏老师代表大家发言。老师们觉得，丁老师是复员军人，政治上最可靠。金宏老师是军属，政治上也没问题，代表大家发言最合适。金宏老师说，还是让丁德泗老师一个人说吧，他政治上可靠，语言能力又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没关系。丁德泗老师首先表示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紧接着又说了一句：“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物……”，没等丁老师说完，张嘉佑就急了，“你这是污蔑我们红卫兵运动，你等着瞧”。第二天早晨，老师们站队集合的时候，来了两个初中的红卫兵，端着木枪，把丁老师押进了劳改队。丁老师不堪忍受劳改队中的酷刑与折磨，特别不能容忍人格的侮辱，从劳改队逃跑了。他先是逃回家，拿了预备役军官证和其它证明材料后，再到空军寻求保护。他是空军复员军人，空军的同志很同情他，可是当时部队没办法介入地方文革，只能建议他去找北京市新市委。丁老师又去找到北京市新市委，新市委让他去西城区委，当时西城区有一个空军联络站，帮助他联系上了新上任的西城区领导王定华，王定华了解情况后给贾延岩打电话，要求决不允许再打丁德泗，空军方面说他没有问题。贾延岩答应了。丁德泗老师8月26日回到学校，回来后没有再挨打，但是有一个负责劳改队的高中红卫兵（我暂时不公布姓名），他威胁丁老师，“你他妈小心点，再逃跑，尅（北京土话“打”的意思）死你，昨天我们尅死了好几个”。听到有人被打死的消息，丁老师吃了一惊，立即向其他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了解情况，得到证实后，他偷偷溜到学校大门口，没有选择个人逃亡，而是勇敢地躲在传达室，悄悄地在传达室老张和其他老师的掩护下，蹲在地上拨通了王定华秘书的电话，将打死人的情况如实汇报。很快，区里就来了人找二附中红卫兵头头谈话，红卫兵疯狂残杀生命的现象受到一定的遏制，丁老师也走出了劳改队。

五，1966年8月19号，星期一。前一天，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学校后，暴力活动迅速升级。宿舍楼北门外面贴的那一副由谭力夫推销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基本如此”，已经变成了“绝对如此”。除了高干子弟曹滨海在和一些红卫兵辩论之外，还有一些同学也在坚持进行辩论，我们初三（6）班的王学忠就一直坚持反对这副推行血统论的对联。在辩论中没有得到胜利的红卫兵气急败坏的骂人，个别红卫兵为了出气，又抡着皮带进入了关押老师的小食堂，抡起皮带去打老师。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看到王学忠同学站在操场东面的跑道上，看着初三年级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从楼上的窗户把他在宿舍用的被褥及其他生活物品全部扔了出来。带头扔东西的红卫兵叫孙增臣，是初三（4）班的，紧跟着他干的两个红战友一个叫浦黑云，一个叫方晓禹，都是初三的学生。他们刚才还在和王学忠辩论，辩论不过王学忠，就采取法西斯暴力手段，把王学忠赶出学校。我看到这情景后，帮助王学忠把被褥、枕头和其他生活用品收拾了起来，重新抱回到宿舍楼上去。同宿舍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堵住了王学忠，不让他进门，还大声叫着：“这是红五类的宿舍，是红卫兵宿舍，不是红卫兵不能进，更不能住在这儿。”其他男生宿舍也没有空床位了，王学忠只能在楼道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也就是8月20号，我用自行车驮着王学忠的行李，帮他把行李送回家，返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了。我在宿舍的洗漱间洗了洗脸上的汗，准备下楼去吃饭，在一楼和二楼楼梯的拐弯儿处，正好碰到初三（4）班的红卫兵孙增臣。其实，我们俩上初一的时候关系很好，此时不知道他招了什么魔了，居然指着我说：“王骥，你老实点。”我回答他说：“你老实点。”他马上就骂我：“你狗崽子。”于是我也回了一句：“你，猪崽子。”他一下急了，说：“你敢骂红卫兵？”我说：“骂你丫的了，你丫就是猪崽子。”他叫喊着：“我们家是革命军人，你敢骂我们红卫兵？”我说：“瞅你的长相，你不是猪崽子，谁是猪崽子，你们一家子都是猪。”孙增臣这小子当时急了，指着我说：“你找打。”我说“你丫敢！”我指着楼梯拐弯儿处的水泥扶手，盯着他的两只小眼睛，跟他说：“你敢碰我一下，我马上让你磕死在这儿。”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有几个下楼吃饭的同学把我们两个人

给分开了。等我吃饭回来，孙增臣带着浦黑云、方小禹等红卫兵和红战友，正从我住的宿舍窗户往楼下扔我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我立即回家拿了照相机，装好了胶卷，把散落在地上的被褥和生活用品拍摄了下来，留作证据。三天以后，8月23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去学校了，以初三（6）班鲁争征（女）为首的一队十几人的红卫兵闯入我家，殴打了我母亲（一位历史清白的知识分子、原全国妇联宣教部的普通干部）抄走了我们家几乎全部的生活用品，包括我那个莱卡120照相机，以及其中拍摄有红卫兵在学校所犯罪行的胶卷。

我所知道的8-25事件中的几个现场凶手和打手的有关情况：

1. 高二有个女生在学校里打老师和校领导打得挺凶，当时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她在食堂门口打老师，食堂的大师傅背后叫她“白不毗咧”，食堂的白师傅说：“这个白不毗咧是个白虎……”，厨师组长石凯说：“当着学生别乱说，都是红卫兵小将……”。这女生长得有点儿瓦刀脸，脸色惨白的，短发，后来知道这人名字叫王谦，几乎所有在劳改队的老师她都打。这个白不次咧王谦，打人的时候，还高喊，说脏话。虐杀革命干部樊西曼的现场，她不仅暴打樊西曼，还一脚将樊西曼从水泥乒乓球台上踹到地下，拿大棍子像砸夯一样砸她。

2. 刘小平，初三（4）班学生，1950年出生，身高一米八四，小脑袋、小眼睛、瘦高个，皮肤发黑，住在花园路一个部队家属院，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刚上初一时，经体育老师刘国祥推荐，刘小平课余时间到什刹海体校参加篮球训练，负责训练的三位教练，除了叶教练是上海体院分配来北京工作的，其他两位教练董广森、祖振生都是师大二附中毕业生，对刘小平特别照顾，精心培养。初二结束升初三的时候，刘小平有两门主要功课补考没有及格，根据学校当时的规定，两门功课补考不及格被定为可以在校试读。他的家长专门来学校找过班主任郝素馨老师，郝老师解释后，家长不满意，一定要见校领导，郝老师把家长带到了教导处。厉益森主任安排教导处的一位老师向家长

介绍了学校的政策，家长提出：“我们是革命干部，我们的子女应该得到照顾……”。教导处的答复是：“根据教育局的文件，试读生可以照常参加班里的所有课程学习，但是不能代表学校参加任何体育比赛……”，还提到了上一年级的例子。也是篮球队的一个同学叫刘小范，平时课余时间先农坛体校练习篮球，由于主要学科功课不及格，初二的时候成为试读生，初三考试仍不及格，被迫退学了。刘小范的父亲是国务院某部重要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孟小幼的藏族同学，父亲是在红军长征过藏民区时参加红军的，也是由于连续两年两门以上的主要学科不及格试读，补考还是不及格，被劝退学了。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每年要对参加业余训练的在校生，进行学习成绩登记和评定，功课不及格者，必须停训，这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和体委共同制定的政策。刘小平拿着成绩册多次找了几位任课老师，希望能够通融一下，给他改一下成绩，把不及格的分数改成及格分数。这个在学习成绩上作假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由于两门以上的功课不及格，刘小平的成绩册不能按时交给体校，体校停了他的训练课，当时他就对这些任课老师以及班主任怀恨在心，多次扬言有机会一定要收拾这帮老师。学习成绩不好，体校又不让打篮球了，他就更不想在学校读书了，希望能有个地方让他去工作，最好是能当兵。四月份，在我和杨林（我同班同学，校篮球队后卫）的帮助联系下，八一篮球队同意刘小平参加初次测试。他骑着墨绿色二六飞鸽牌自行车，从北太平庄一直骑到了海淀区红山口八一体工大队，负责对他进行考试的是正在组建中的八一青少年队的教练韩子栋和周正云。两位教练对他的身体条件以及篮球技术都不是很满意，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两位教练告诉他半年以后，如果身高长到一米八七，可以再来试一试。在一旁观看测试的北京籍八一青年队的张宏告诉刘小平：“想进八一队的人挺多，现在进来很难的。”刘小平回到学校后，每天都做有助于增加身高的运动。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学校很快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8月1日刘小平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声称自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对于老师们的报复也就从此开始了。

刘小平经常抡着军用皮带或拿着垒球棒，出入非法关押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小食堂（当时是私设的劳改队监狱）殴打老师。“八一八”以后，刘小平在篮球场亲口说过，他们几个爱打篮球的红卫兵在篮球场的三秒区罚球线上进行投球比赛，谁进球少就算输了，输的人就进入篮球场旁边的小食堂打老师，然后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刘小平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虽然瘦，但是会用爆发力打老师，说有些红卫兵虽然块头很大，只会用蛮力，远不如用爆发力打得狠。

平时，有一些初一、初二的红卫兵在那里看管被非法关押的老师，他们拿的都是练习刺杀用的木枪，打老师的时候，除了用军用皮带抽，用木棍揍，还用木制的枪头去杵。刘小平指导这些初一初二红卫兵打人的技巧，让他们将木枪掉过来用，用枪托打，打得狠，打得疼。8月25日下午在杀害樊西曼的过程中，这些木枪真的派上了用场，施暴的红卫兵用枪托击打、狂砸樊西曼。打死樊西曼之后，他们又用木枪的枪托，砸向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们。有一个红卫兵抡起木枪的枪托砸向崔胤魁老师的头部，崔老师因为年轻时学过体育，反应比较快，下意识地抬起胳膊保护自己的头，木枪托打在了胳膊上，胳膊立刻就被打断了，造成严重的骨折。接着，红卫兵又打折了另外一位教政治的男老师的胳膊。

虐杀革命干部樊希曼时，刘小平用的是一根大棍子，他像砸夯一样，用棍子的一头砸向樊西曼。同时，他还吩咐同班一个叫钱欣的红战友一起打。（学校“红战友”是个松散的组织，负责人是张嘉佑，各班红战友跟着同班红卫兵一起活动。）钱欣家住钢铁学院，也是篮球队的，身高一米八多，平时还练习推铅球，比刘小平力量大。他就听刘小平的指使，跟着刘小平一起打，让他打谁，他就打谁。

红卫兵后期，刘小平拿来一只抄家时保存的气枪，藏在学校隐蔽处偷偷向老师和他不喜欢的同学射击。

1968年刘小平去东北当兵了，一年以后，死于意外事故，时年20岁。

3. 文革前，高二的刘诚是学校足球队的，业余时间和初三（4）班赵东辉（小黑子）一同去北京市少年宫足球队参加过训练，我在少年宫篮球队，篮球场就在足球场旁边，每次练球时都能碰上，一来二去大家就熟了。文革中，刘诚打人挺凶，还打同学，连女同学也不放过，军宣队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刘诚感到很恐惧。我去下乡插队之前见过他几次，那一段时间，他显得特别胆小，我和他没有利害关系，从来没发生过冲突。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王殿修也是老红卫兵，对刘诚也有一定了解，我们都觉得刘诚有心理障碍，文革中打人太多了。我们班的王新生同学是校足球队的，也参加了红卫兵，他亲口对我说：“刘诚丫的真没劲，连咱们学校女生都打……”。红卫兵解散后，刘诚一直害怕别人报复。有一次我们在宿舍打拳击，有人说刘诚也练过，而且说他块大，邀请他来我们宿舍交流一下。我让初一、初二的同学几次叫他，他就是不来，后来还是我硬把他拉来了。来了后我们让他带上拳击手套，他就靠着墙角一动都不动，拿手套捂着脸。他说：“你们要想打就打我吧，我不动了。”当时显得特怂，说话也结巴了，临走时他说：“我担心你们在宿舍里堵上门打我……”。其实根本没人想打他，是他自己打人打多了，担心别人记仇，怕我们替别人报仇，收拾他。我们和他无冤无仇，更没有人托我们复仇，是他有心病。🔒

## “北京师大二附中文革“八二五”事件还原与反思”

### 座谈会记录辑要

时间：2016年2月25日

主旨：厘清事实，还原历史，深刻反思，寄托哀思，以警后人

召集人：于海宁

参加人：陈涵实 尹平 于海宁 陈定兰 朱今天 郭玉 季烨

记录及整理：季烨

**整理者前言：**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发生曹滨海事件，并随即红卫兵疯狂报复，在校内打死曹滨海母亲樊西曼、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以及青年教师靳正宇。整个事件当时被称为“八二五”事件，在北京市影响极大。当时在事件现场的主要为曹滨海所在67届高二1班的部分同学以及初中红卫兵。时隔五十年召开本次座谈会，关键人物陈涵实和部分当事人尹平、于海宁、陈定兰参加了。他们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当时情况，挖掘细节，努力还原历史真相，以期从中总结教训，警示后人，更寄托对亡故同学的无限哀思和对他及其家人的深刻歉意。他们反省的自觉、彻底、坦诚、勇气，深深打动了我；这份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探究真相的执着与良知，使我深受教育。

本文为记录辑要，只对座谈会记录作删节调整，所录基本是原话。小标题是我加的。。

**于海宁：**

2015年11月，我在网上读到了季烨写的多篇关于师大二附中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暴行事件的文章。12月郭玉发来微信，转来季烨提给她的有关“八二五”事件细节的问题。我知道此前班里有人一直在想方设法探究事件原委，因此想到尽量把相关当事人找到一起，共同回答季烨的问题。经联系，得到多数同学的支持。我想的是，大家可以从多个侧面回忆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助于把事件的真相完整地记录下来。

**（以下为于海宁在会前的微信）**

没有人追究责任，我们却不能因此稍感轻松，我们或许在文革中做过错事，回忆文革会给自己带来深深的悔恨和痛苦，但这痛苦更甚于受害人么？不会吧，为什么己所不欲，却曾施加于人呢？想到这，我们未泯的良心是否应该为受害人为历史有更多的承担呢。

陈涵实（会前微信）：

弄清楚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惨痛的事件来龙去脉，道歉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让这种全民疯狂的荒唐事情不再发生，不仅有我们的忏悔，也有对后来人的启迪和警示。

朱今天：

陈涵实今天能来参加，我非常感动，对他表示敬意！

陈涵实：

应该的。

朱今天：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去曹滨海家？现场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各种说法不太一致，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事实甚至包括细节弄清楚。

## 一、为什么去曹滨海家？

### 1. 思想前提

陈涵实：

文革刚开始，我整个思想极左，绝对化。上边总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使我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于是，我对来自“上面”的危险格外警觉。斗学校走资派我不感兴趣，我觉得，彭真他们搞黑线，能到二附中？几乎不可能，二附中顶多是个小科级单位，我不相信。818之后，抄家破四旧，我没有抄家，我曾经对贾YY（红卫兵领导人）说：是不是应当管理一下，要求一下，不能让低年级同学再这么胡来。贾YY说：“现在是需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时候！不要婆婆妈妈的设那么多条条框框！”可是我认为，修正主义呀，复辟什么的，肯定是走上面，不会走下面，下面广大人民群众不一定搬得动。

我当时特别想干点事，挽救党，一心只想找黑线，找上面的黑线。



## 2. 事件开始在“八二五”之前

### (1) 8月23日晚

陈涵实：

8.23晚上，李WL（红卫兵领导之一）让我去跟何、韩（时任铁道部党校副校长何FC及其妻韩××）谈谈，听他们介绍一下铁道部党校运动的情况。在这之前他把何韩弄到学校二楼的一个教室里，桌上搭铺让他们睡。李WL是把何、韩保到学校的。

众：

李WL怎么会和何、韩搞到一起了？

陈涵实：

这里面的内情我不太了解。我只知道818之后，李WL一直在北太平庄一带活动。在这阶段他把何、韩保到咱学校。文革中他折腾挺欢。李WL让我去谈，我就去了。听何韩介绍铁道部党校迫害工农老干部搞武斗，说樊西曼（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曹滨海同学的母亲）迫害他们。他们的介绍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铁道部党校有问题，加上我一直认为真正的修正主义应该在上边，于是对铁道部党校的第一印象不好。

季烨：

铁道部党校级别挺高的，据说是铁道部第一副部长兼任校长党委书记。我听说，何FC资历比樊西曼老。听党校人说樊西曼朴素得像个农村老太太，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人缘好。文革中与何、韩分属两派，多数派拥护她。

陈涵实：

如果没见到何FC，我不会带人去曹滨海家。因为一直没感到樊西曼有问题。

我原来对樊西曼印象还挺不错的。高一时候她来过几次。自从听说她迫害工农老干部，心里就警觉了，会不会有黑线？觉得应该把问题弄清楚。

于海宁：

有位初中同学最近回忆，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学校有老红卫兵（主

要是反对李 WL 极左做法的部分人) 议论过并写大字报, 公开了一些“八二五”事件的背景。提到文化大革命前, 何 FC 曾经在铁道党校受过处分, 降级降薪, 而当时樊西曼是领导班子成员。文革开始时, 各单位响应中央号召, 炮轰当权派。此时何 FC 在党校写大字报, 说樊西曼迫害他。“八二五”樊西曼被害是何 FC 借二附中红卫兵之手报私仇。是李 WL 把何 FC 接到学校小楼藏起来的。

季烨:

我在调查中听不止一人说过, “八二五”前后何 FC 夫妇被咱们学校红卫兵保护, 直到学校劳改队解散后他还住在咱们学校小楼里。

## (2) 8月24日

陈涵实:

8月24号那天, 是咱班同学说陈定兰父亲有好多经书, 床底下有臭虫都不忍心弄死, 破四旧, 抄出好多经书, 去看看。我就跟着去她家看了。

陈定兰:

是说让大家自己回家造反, 然后红卫兵挨家去检查。我们那时是红战友, 没有主动权, 只有听喝的份儿。记得到我家检查不止陈涵实一个人, 有好几个人一起去的。

陈涵实:

我去看时, 经书已经快烧完了。这时有谁说: “曹滨海家就在对面。”一听说对面是曹滨海家, 我想起——临时想起的——何、韩说的樊西曼的事。

陈涵实:

我们就去曹滨海家了。樊西曼在家。我就审了她几句(厉声地):

“有没有黑帮黑线?!”

“你上面跟谁联系?!”

“你是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老实交代！”

现在想，这几句话问得特恶心，特幼稚！

我让她低头，反省。然后拿报纸写个条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贴在她家墙上。然后我们走了，前前后后全部时间也就10分钟左右。这是24号。曹滨海没在家。

### （3）我触碰了曹滨海心中最神圣的

陈涵实：

文革前我和曹滨海是同桌，关系不错。文革起来，我昏了头，当时不觉得去他家查黑线不对。后来我才深刻感到：母亲是人生最伟大最神圣的，尤其是曹滨海这样的孩子，单亲家庭，母亲是绝不能触碰的！触碰他的母亲，就是对他最大的伤害，比伤他自己还严重！我那时还想的什么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呀，我那是绝对的混蛋冲动！我不该这么做。

朱今天：

去同学家抄家、破四旧，都是侮辱性的。

当时如果他妈妈是地主也只能忍了，可是曹滨海心中他妈妈是革命干部。

## 二、“八二五”曹滨海事件过程

### 1. “八二五”当天中午：有人提议去曹滨海家

尹平：

就是“八二五”那天，上午去几位同学家“检查”破四旧情况，具体去的谁家、都有谁去记不清了。记不清楚是中午还是下午，完全是随机性的，有人提议“去曹滨海家。”谁说的记不清楚了，提议下午去曹滨海家。

陈涵实：

8月25日这天，史DP（本班同学，红卫兵）说：“曹滨海说‘陈涵实敢到我们家来吗！’”

我心想，不就是辩论嘛，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当然敢了！”

陈定兰：

我记得当时听说：曹滨海知道咱们去了他家，特别生气，说：“有种的你们冲我来！”

尤其是点陈涵实名，让他去。

尹平：

印象里陈涵实说：“你们前头先去，我们有点事儿。”前头先去的有我、陈定兰、于海宁、史DP。

陈涵实：

先去曹滨海家的是史DP带人去的，我说我有事，你们先去。

## 2. “八二五”下午：第一拨同学去曹滨海家

尹平：

我敲的门。曹滨海开的门，说：“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造反来了？！”

我们就说“我们来破四旧”“造反”之类的话。

陈定兰：

我们围着，没说几句。他极不情愿地让我们进去了。

问：

你们知道他妈妈是“黑帮”吗？

尹平：

没这印象。我好像不知道他妈妈是黑帮。

问：

你们不可能去红五类家破四旧。

尹平：

看来应该知道。

众人：

史 DP 前一天跟着陈涵实去曹滨海家审樊西曼了，她肯定知道。

陈涵实：

认为她是黑帮，要不怎么敢去（她家）！

尹平：

曹滨海非常生气，“谁让你们来的！？”他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按到墙上，他生起气来，力气特别大，我个儿不矮，可我挣不过他，脖子都掐红了，有印儿。我挣扎过程中，他情绪平和了一些。我们几个你一句我一句的说，没有任何行动。

问：

没有辩论对联？

尹平：

没有具体说这个。就说，我们就是为破四旧来，就有理！你没理由说不让我们来！

有谁提了句说：“陈涵实还要来。”

曹滨海说：“他要来我就敢砍他！”“你们来我早有准备！”

说着他就从进门右手一个小窄的房间，我当时以为是厨房，不一定是，记得靠墙有很多书架子，曹滨海拿出一把菜刀，刀就拿出来了，拿刀意思是要劈陈涵实。

于海宁

刀是从厨房里，就是尹平刚才说的那个小屋里（当时以为是厨房）

拿出来的。

尹平：

那会儿还没到砍人的时候呢。我心里有点害怕，他放下刀，我就把刀插到书架上的书里，下意识地掩藏，只露个刀把。

### 3. “八二五”下午：陈涵实带一帮初中红卫兵来

尹平：

后来来了一帮人，陈涵实为首，和外班的，初中老红卫兵，女的居多，一大帮，至少四五个、五六个人。

尹平：

和我们先去的隔了有一个多小时。

陈涵实：

曹滨海说“陈涵实敢去吗”，我当然敢去！我先去调查了点什么，完事之后，也没吃饭我就去了。路上碰上几个同学，就一起去了。

尹平：

曹滨海特别激动，陈涵实一来马上形成他们二人对峙的局面，其他人围着。他们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记得陈涵实说：“你们家是黑帮，上你们家是应该的！”“调查黑线来了！”

陈涵实：

有印象，我说：“上你们家调查黑线来了。”

尹平：

记得曹滨海说你们家怎么着怎么着，陈涵实说：“我们家怎么着？！你到报纸上看去！”那时候他家还没挨整、没倒呢。忘记是谁说的：“刚才曹滨海还说要砍你呢！”陈涵实说：“把刀给他，让他砍个试试！”史 DP 进屋，把刀拿过来。我记得特别清楚，（作侧身、右手在前持刀动作），她这么拿着刀，挤进人群。我现在特别后悔，当时没从她手里抢过刀藏起来，而是傻呆呆地看着事态发展。

于海宁：

我有印象，我站在人群后面，看见史 DP 拿着刀，侧身，挤进人群中心，曹滨海和陈涵实面对面站着，周围很多人。

尹平：

当时我就想：“怎么那么傻呀，说拿刀就拿？！”这时候刀已经塞到曹滨海手里了。

朱今天：

不是陈涵实手里？他们家人听说是陈涵实把菜刀递给曹滨海的，看来是记错了。

尹平：

肯定没递到陈涵实手里。

陈涵实：

我确实不知道刀什么样。

众人：

史 DP 去世了，有这么多证人呢，毫无疑问是史 DP 把刀递到曹滨海手里的。

朱今天：

当时在场的红卫兵 LYF 曾经对我说：史 DP 从厨房拿刀递给曹滨海，说“你砍呀！”

尹平：

曹滨海刀拿在手里，其实是话赶话赶到这份上了，有点迫不得已的局面，如果把刀藏起来或者没人把刀递给他，形不成这局面，至少递到他手里太不应该，这是激他。

于海宁：

周围一片喊声“你砍呀！”“你敢砍吗！”都认为他不敢砍，激他。尤其是那几个初中女红卫兵，喊得特别厉害。

尹平：

不应该拱火，太幼稚。

尹平：

曹滨海抡起刀，一刀砍在陈涵实前额，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陈涵实已经往前倒了，后脑勺露出来，曹滨海又是一刀，大家都懵了。

于海宁：

我看见陈涵实捂着头，低下去，曹滨海又砍了他后面。

砍以后大家都吓懵了，我们赶紧护着陈涵实下楼，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清楚了。

### 三、曹滨海砍陈涵实以后

#### 1. 北医三院

尹平：

我们赶紧架起陈涵实，下楼上医院。我身上前边全是血，站在马路边拦车。

于海宁：

记得咱们拦的车是吉普车。尹平、陈定兰和我挤上车，一路骂反革命，到三院。

尹平：

北医三院一听红卫兵被狗崽子砍了，用现在的话说，“哗！”一片绿灯，从紧急处置室一直到病房。

陈涵实：

我没昏迷，只是被砍的一小段时间没知觉了，但知道尹平他们截车送我，没感觉疼，只感觉好像血在我和尹平身上哗哗哗流。

尹平：

后来他父亲来了还是父母都来了。

陈涵实：

我父母都来了。

尹平：

他爸是革命干部，他说：“我有三个儿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献出一个光荣的！”

当时说得我特激动。记得护士还主动给我们打了饭吃。中间公安局来人看陈涵实的伤，做笔录，还看了我的脖子，被曹滨海按到墙上手掐的地方。



## 2. 党校家属宿舍

朱今天：

据说你们去医院后，剩下的同学打曹滨海，打得特别厉害，眼睛都肿了，用皮带抽。咱们学校同学把他家的家具都从窗户里扔到楼下，就地焚烧。曹滨海两个妹妹，一个初中，一个小学。他小妹妹在场，不满12周岁，54年10月生的。叫樊小曼。咱校红卫兵不认识她。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众人：

后来公安局的来人把曹滨海带走了。曹滨海如果不是被关进公安局，肯定被打死了。

于海宁：

“八二五”事件第一现场，是在曹滨海家发生砍人事件。第二现场是在曹滨海家，打人，全部家当被焚烧。不知道是什么人领头干的，到现在没有人承认并道歉。第三现场是在学校，三个人被当场打死。樊西曼是被什么人从铁道党校弄到学校的，到现在也仍然是个谜。

## 3. 学校里

### （1）红卫兵当天打死三个人

季烨：

这场悲剧引发二附中更大悲剧：红卫兵为报复，把曹滨海母亲樊西曼揪到二附中当天打死，把二附中姜培良书记当天打死，把靳正宇老师打死，多少老师被斗被打被抄家，多少同学被打被骂被罚跪被轰出宿舍被抄家，始终没查清楚。有杨大同同学写《“八二五”事件》，我的《“八二五”事件补充材料》等文。

朱今天：

在当时那种革命形势下，“八二五”事件激化，主要是激化了红卫兵的愤怒。

郭玉：

我没看见打的情况。当天我在宿舍，听见广播里声嘶力竭地喊：“狗崽子杀人啦！”我震惊，想赶紧跑去北医三院看陈涵实。走到校门口正碰见靳正宇回来，他一进校门，抱着头跑，那条笔直的路，红卫兵拿着棍子追。

朱今天：

我从师大刚回来，天快黑了，在学校大门口里，看见一辆平板车往外拉，樊西曼已经死了，打得衣服全烂了，白衬衫都打飞了。拉走（谁拉的没印象了）。我看见厉益森随后也被小三轮车拉到医院去了。

郭玉：

下午回到学校，一进门就看见几辆平板三轮车拉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往校外跑，后面跟着好多红卫兵，同学告诉我那是刚刚被打死的樊西曼、姜培良、靳正宇，我惊呆了！

## （2）外校声援

季烨：

我看杨大同文章，说当天晚上师大谭厚兰带人到咱们学校游行，声援二附中红卫兵。

尹平：

哪止师大呀，来那么多人！晚上我回到学校，学校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各学校的打着旗子到二附中来声援。中学？大学？记不清了，满操场全是人。我先到一楼尽东头，跟红卫兵汇报前后过程。后来也不知被谁要求的，让我到大操场乒乓球石台上介绍过程。我上去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遍。我处于义愤中，充满左的革命义愤。后半夜才清静。第二天仍然不断地各校排队来声援，操场群情激奋，分不清本校外校的。

尹平：

不记得台上有主持人。不像是开大会，是一拨一拨的人，来了走，来了走。

我上台不知是谁要求的，我不可能自己上台。

### （3）二附中红卫兵宣布要召开十万人大会

于海宁：

后来听说我们班的一位红卫兵宣布第二天要开全市十万人大会，公审曹滨海，打死曹滨海。

朱今天：

当时钟××在大会上，就是尹平介绍情况的那个现场，以学校红卫兵领导身份说：“我们要开十万人大会，把毛主席请来，在会上要把曹滨海打死！”是在大喇叭里喊的，我当时一直在校门口。后来，大会的门票都印出来了，票的背面印着几条：1. 我们强烈要求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大会；2. 只允许红五类子女参加大会；3. ……。这个大会没开成，票都留下来了，我曾经保留了一段时间。

郭玉：

红卫兵要在工体开十万人大会批斗曹滨海，幸亏周总理管了（才没开起来）。

### （4）引发社会更大的虐杀潮

朱今天：

818以后是红卫兵到社会上打杀高潮，“八二五”以后是更大高潮，有统计曲线。认为曹滨海和8月24号李文波事件是杀红卫兵，是阶级报复，“八二五”之后，就是所谓“防止阶级敌人搞阶级报复”，包括大兴县大规模有组织杀人，才一家一家灭门的。

于海宁：

“八二五”以后咱们学校红卫兵到社会上打人。

朱今天：

咱校红卫兵在校外也打死过人。我听人说过。

陈涵实：

听说抄天主教堂慈幼院，包爱德修女，地安门东大街57号，就有咱们学校的同学参加，

上来就打，不让人说话。

## 四、“八二五”事件后遗悲剧

### 1. 曹滨海家破人亡

朱今天：

樊西曼被打死，曹滨海被关进公安局，家破人亡了。

于海宁：

曹滨海小妹妹樊小曼，1966年8月25日一夜之间，她的母亲被暴打致死，她的家被付之一炬时，她还不满十二周岁。从此东躲西藏，寄人篱下。

季烨：

网友有人看见过焚烧樊家东西这场面，怒斥打人的是畜生。我一大学同学是他们党校家属，在那天焚烧现场看到樊小曼，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场面这种惨状，对一个小孩子得是多大的刺激！

于海宁：（念自己写的微信）

这几年又听说樊小曼不到退休年龄头发全白了，童年的刺激使她患上重度抑郁症，几近痴呆。我感到文革对人的伤害还在继续着。我不能想象你我的女儿在那个年龄就家破人亡。她有罪吗？谁把她害成这样？五十年了，她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多不公平啊！！

朱今天：

曹滨海家破人亡后，我曾经和同学去监狱（半步桥看守所）看过曹滨海。公安局表示应该是保护性拘留，说如果当时把曹滨海放到社会，他就会被打死。听监狱方面说曹滨海在看守所里神经已经时时有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见到的曹滨海精神状况还可以。

于海宁：

下面是高和林同学的微信，他在上海：

我与曹滨海从小就是同学，他很优秀。我听说他到南口车站工作后，曾经想去看望他，再打听说被火车压死（我怀疑是自杀）。

朱今天：

曹滨海妹妹曹滨平告诉《文革受难者》作者王友琴，曹滨海是在1985年，他38岁时去世的。他在南口机车车辆厂，机车撞死的，8月份，他妈妈忌日前后几天里，猜测是精神恍惚，细节不清楚了。他家家破人亡了，我一直想去他的墓地看看，但始终没落实地址，想给他送一束花。也想过，如果找到曹滨海的墓地，就私下里约陈涵实一块去看看他，坐一坐，也算……

陈涵实：

应该！应该！

## 2. 何、韩为此受处分

陈涵实：

文革后，铁道部党校找我调查。我和何、韩没有交往，就是8月23号那天了解樊西曼情况。铁道部党校认为樊西曼的死与何、韩散布她的材料有关，是惨案的至少是间接作用。铁道部党校是公正评价。至少一点：我去樊西曼家，问题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就是他说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和，受打击迫害。

季烨：

我有位同学打听说，文革后铁道部还是党校党组织给了何FC党内处分。还听说对何FC夫妇二人都给了处分。

## 3. 留下多少愧疚和内心的煎熬……

陈涵实：

我在医院，同学（红卫兵）来看我，告诉我把樊西曼打死了，把姜培良捎上了，还把靳老师也捎上了！我听了，我那心哪，没法形容，真像一盆冰水哗一下泼身上一样，肉皮发麻，感到事情闹得太大了，弄错了，不该这么搞！我心里特别痛苦特别难受！当时我就感到樊西曼再错也不该死，姜培良再有问题，也不该死！国际上还有不能虐待俘虏呢。尤其是对靳老师，我对他印象相当不错，他当时是隔壁教室五班的班主任，我对他印象相当好。那时候极左，老毛影响大是问题，同时是自己混！我害了三条命！不见得就三条命，其他学校因此引起的，弄在一起的，不知有多少条命！叶剑英说文革搞死两千多万。有罪！……不能全推到上面，四人帮为主要，我们自己有一定关系，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可能放下，一辈子都不能谅解自己！

朱今天：

LYF（同班同学，红卫兵）曾经对我说，“八二五”之前曹滨海找她说“咱俩谈谈”，她拒绝了。她说：“我要是谈了呢，关系不就缓和了！，说不定“八二五”这事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我特别后悔！”

陈涵实：

她当时如果和曹滨海谈了，我们再交流一下，可能就不会参与铁道党校的事了。

### 【后记】

两个多小时，陈涵实说了多次：我挨两刀是应该的，不该到人家去侵犯！想起这事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有罪！自己混！文革时我昏了头！

通过这次座谈会，在还原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惨痛事件的来龙去脉过程中，我们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反思：我们为什么那么冲动，做出令自己后悔终生的蠢事？我们深刻体会到，文革前长期极左宣传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造成我们不会独立思考，没有最起码的分辨力和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崇尚；那场被别有用心发动的文革，在全社会各群体之间人为制造对立，煽动毫无人性的残酷斗争，造成中国社会发展“史无前例”的大倒退，此

时我们的愚昧，盲目，冲动发展到了极致，终至酿成“八二五”事件的惨剧！而这也是文革极其荒谬和反动性质的缩影。在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我们对“八二五”事件进行细致还原与深刻反思，真诚忏悔，向曹滨海同学及其家属表达我们无尽的哀思与深深的歉疚，以此表达我们对彻底终结类似文革这样的反人类反社会现象并警示后人的衷心期盼。🔥

## 还原与反思”座谈会后续

### 一、座谈会尚存在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几十年来，以下两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此次座谈会这两个问题尚没有得到明确解答：

#### 1. 去曹滨海家是去辩论对联吗？

朱今天：

原来听说，你们俩事前在班里就对立？为了对联？

陈涵实：

没有，文革前关系不错，坐一个位子。文革中为破对联和曹滨海、乔志海拌了几句嘴，不记得有什么辩论，都是男生之间那种拌嘴，一般应该是过后就忘的。记得曹滨海还说我“你说过想当皇帝”之类。文革时不是特别僵，主要因为冲击他母亲。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母亲在儿子心中的地位是最神圣的。如果有人触动我的母亲，我也会非常生气的。

郭玉：

你们去跟对联有关系吗？是辩论对联吗？

众人：

没有。不是为了去辩论对联。

陈涵实：

“八二五”之前李WL就要把出身不好的同学赶出宿舍食堂，找我商量我没同意。红卫

兵很多人都对他有看法。

陈涵实：

去曹滨海家跟对联没关系。我一直认为投胎是技术问题。

陈涵实：—

我从来对对联不感兴趣，我觉得投胎是技术问题，自己不能左右。我去他家就是揪黑线去了，所以我审樊西曼，问她（厉声）：“你有没有黑帮线？”“你上面跟谁联系？”  
“老实交代！”

于海宁：

我以前回忆此事，一直以为到曹滨海家是去辩论对联。因为我印象很深的是，曹滨海坚决反对对联。老兵把对联的横批由“基本如此”改为“绝对如此”，曹滨海写的大字报题目是“绝对如此绝对反动”，大字报贴在教学楼西门的北向，大门的上方。

## 2. 是去抄家吗？

季烨：

去曹滨海家是去抄家吗？

尹平：

当然不是抄家，只想去破四旧

陈定兰：

（去曹滨海家）跟去别的同学家一样。

去 ZHBQ 家也是去检查（破四旧情况）的。

陈定兰：

记得到曹滨海家是从我们家过去的，陈涵实到我家检查破四旧情况。后来就发生了砍人  
事。

陈涵实：



其实不是检查，就是有同学说她们家有很多经书，看看去。“烧经书了，看看去！”

众：

记得咱们班同学去过 TDY 家、陈定兰家、于海宁家、尹平家、都是自己回去先破四旧，造反。据说还去了 HRY、ZHBJ 和其他同学家。

尹平：

那时候说都自己回家造反，然后让红卫兵来检查。我就是自己先回家破四旧造反，然后请红卫兵来检查。TDY 家也是以这个理由去的。

陈涵实：

整个文革，我对底下胡搞没兴趣，一直想抓大黑线。

那时我对上社会破四旧不感兴趣，对批斗学校领导不感兴趣，……了解了樊西曼的事，我一心想的就是去她家追查黑线。包括 TDY 家里的事，他父亲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 二、座谈会后季烨与陈涵实的交流

### 1. 关于对联

季烨：

你是不同意对联的，但你怎么会“为那破对联和曹滨海他们拌了几句嘴”呢？

陈涵实：

当年和曹滨海到底是为啥吵架记不清了，可能只是为了红卫兵的名誉吧。

### 2. 是去抄家吗？

季烨：

座谈会上陈定兰尹平等同学都说：班里红卫兵让大家自己回家破四旧，然后红卫兵去各家检查（破四旧的情况），是你安排的吗？除了去陈定兰家，别的同学家你去过吗？你抄过家吗？

陈涵实

我当时在班里说过让大家回家自己造反破四旧，的确没有安排过检查，当时没有计划到任何人家去，去陈定兰家是同学们说她家有好多经书，叫我去看看。我没有到别的同学家去过，没有抄过家。

陈涵实

文革初，我们班比较团结没有分裂，红卫兵闹得太欢了，造成我和同学隔阂。

### 三、于芳民同学的微信

说明：

座谈会辑要草稿在原高二1班群中发表，于芳民同学写了长微信，谈对座谈会的感想，也谈了他记忆中“八二五”之前陈涵实与曹滨海关于对联的辩论、曹母亲是走资派、抄家问题。于海宁的微信也印证。

#### 1. 于芳民谈陈涵实与曹滨海关于对联的辩论

于芳民：

“八二五”事件时，我没在学校。但8.23陈涵实和曹滨海在教室争论时，我在场。陈涵实提到乔志海在场，还有几个人，我也记不清了。教室当时应该有十来个人，但有些人是在前边，曹滨海，我，还有两三个人在后边。

铁道部党校的背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但陈和矛盾的升级确是由对联引起。

818红卫兵受接见后，引发两大突发矛盾激化，一是红卫兵开始用武力进行大面积抄家和武力批斗；二是通过谭立夫事件开展血统论的灌输。当时真谈不上讨论，主导潮流是绝对如此。想想遇罗克的遭遇，就知道当时是多么红色恐怖。

当时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正在教室和曹滨海等聊天，陈涵实进教室了，我感觉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在前边和别人打下招呼后，看到曹滨海，就走过来，冲曹滨

海说，你贴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曹滨海回答说，血统论不对。（都是大概意思，具体话记不那么清了）

## 2. 于芳民谈到关于走资派和抄家问题

于芳民：

后来没几句话陈就说到曹滨海的妈妈是走资派。曹滨海说：你说我行，别说我妈。陈涵实话的意思是：说你妈怎么了，你妈是走资派，还要抄你们家呢。曹说，你敢去吗，陈说怎么不敢，曹说，好，我在家等着你。到此，陈涵实等就走了。

那些天抄家挺多，他当时作为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有点赶哪算哪的意思。

当时认准（是去）抄曹滨海家，也是几方面因素促成的。我了解到我们班还有几个人不想再和班里的人多接触，也是和那时班里的人组织去抄家有关系。这种阴影很难抹去。抄曹滨海家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我认为和前一天两人的较劲有很大关系。

现在想来，我们在那个背景下，不少人很冲动，不能自己，革命头脑膨胀，但绝不会想到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

## 3. 于海宁微信予以印证：

从于芳民的回忆看，我记忆中去曹家跟辩论对联是有关的。

曹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在班里反响很大，老兵（陈涵实）们去曹家之前，已在班里公开说过曹的母亲是走资派。这时曹有些压力，才有了朱今天说的，LYF同学回忆里的曹曾经想找她（她也是老兵）个别谈谈。可惜她拒绝了。

我回忆中的印象不是没根据的。郭玉也有此印象。

## 四、季烨与于芳民就其微信的交流

季烨：

芳民好！看到你在你们班群发的微信了。关于曹陈辩论对联事，我能用吗？我一直认为到曹家抄家关键是曹明确反对对联，另一是何的利用教唆。你的记忆是补充。陈涵实承认辩论是为了红卫兵荣誉。其实他内心对对联并不认同。

于芳民

季烨你好！关于陈和曹为出身论的辩论情节你可以引用。我对当时的主要场景和内容记忆不会有大的偏差，我是负责的。

因为当时陈和曹在班上辩论，我认为有偶然成分，但我看了座谈会大家的发言后，又感到也是必然的。当时两人辩论时间不长，陈是直奔大字报主题，且言辞激烈。曹敢贴出大字报，也是下过决心的，当时文革还没出现武斗，查抄家也在初期阶段，总的也还文明。双方都是高干子弟，也处于血性方刚时期，不会考虑到后果。曹尤其是提到他母亲是走资派时，很气愤，很激动。当时陈也没多纠缠就走了。旁边就三四个人，前面的同学可能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就散了。我当时在班里的时间不多，也不知那些铁道部党校的背景情况，所以也没认为是多大的事。谁想到由此会引发全市全国性的血腥抄家，打人直至武斗风潮。

## 五、季烨与陈涵实就于芳民信的交流

陈涵实，你好！

我想就于芳民微信跟你沟通一下。你在班群里看到了吧？有同学担心它会让你“面子上挂不住”。我也有同感。如果是我，心里肯定会别扭的；何况你站出来本身就是顶着内心和外界的巨大压力的，现在可能又添了一份。这种事情，旁观者、说者，容易；当事者、实践者，难。我是相信你的，这是前提。当然我也相信于芳民，他的话挺诚恳的。我想说的是：于芳民这封信，恰好填补了欠缺口，使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更深刻了一步。你可能知

道，过去，学校里很多人一说起曹滨海事件，多数都认为你们去曹滨海家抄家，你同学中也有认为是去辩论对联的。

一、关于那次辩论对联，你肯定是忘记至少是记忆不深了，所以你说“为那破对联辩论了几句”“是男生间的斗嘴”。很多事情忘记了，这太正常了，毕竟五十年了。而你俩辩论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刀砍事件，所以于芳民记住了他唯一经历的这次——曹滨海事件中你们俩的辩论对联，如他所说，都是高干出身，都血气方刚，较劲。

对联，是当年红卫兵建立和维持的理论支柱。红卫兵是以对联划线的，谁反对对联，就是反对红卫兵。所以，我知道你内心不同意对联，我还知道有不少红卫兵，内心对对联也是有看法的，但是，更多的是惶惑和盲目冲动，因为红卫兵是毛支持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干出今天不可想象的事情。你跟曹滨海之辩论对联，我看主要不在对联本身，而在于他的态度，敢于公开反对红卫兵！今天记载的“盛气凌人”，就是你当初自以为的“义正词严”。所以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与曹等辩论对联”时说：“可能是为了红卫兵的荣誉吧。”我认为你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你记得座谈会记录里，你说：“八二五”去曹滨海家之前“有人说‘曹说陈敢来吗？’我说‘不就是辩论对联嘛，有什么不敢的！’”可见“辩论对联”在你心里还是有分量的。

二、关于抄家，可能因为你和曹滨海在那次辩论时说了“还要去你们家抄家呢！”所以给同学留下了印象。更重要的是，“红八月”，特别是8.18之后，红卫兵去谁家造反、破四旧，当然是抄家。你们班一些同学之所以再不愿和同学来往，就是因为被抄家——尽管你开始还“在班里说过让大家回家自己造反破四旧，的确没有安排过检查。当时没有计划到任何人家去，”但是在8.18以后那样疯狂的形势下，你不仅控制不了你们班的局面，实际连你自己的行动都控制不了。你们班即使不是你、也自然有其他红卫兵带人去别的同学家抄家，直到最后你们去了曹滨海家。

我的体会，抄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红卫兵去我家抄家时，我哭了。红卫兵领导人训斥我：“你哭什么哭！你要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呀？！”直到前两年我才想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哭——我在学校挨骂挨打时都不哭，还多多少少进行反抗，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们还是一个革命阵营里的，他们打人骂人是错的，我有权利反对；一抄家，就把你从革命阵营甚至人民队伍里驱逐了，别说批评他们，你和你的家庭一起成为劣等贱民了！曹滨海更加不同的是，他一直是高干出身，从文革前业已造成、文革中更是甚嚣尘上——无论实际地位还是心理上，他都是高贵的；岂能容你小小陈涵实给他妈妈定性（你也说过，铁道党校樊、何都有大字报，都有群众组织拥护，就是说，党校都没有给樊西曼定性！）、岂能容你把他家从高高在上的革命干部一下子拉到卑微低贱的黑五类群体里！在文革中，这两类人地位实在是天上地下！这种被侮辱的感觉，远比如我这样被抄家的同学强烈得多！它所激起的愤怒，让曹滨海拿起刀，就不足为奇了。何况，他对他妈妈感情那么深，更不容你侮辱他妈妈了。

三、关于查黑线。其实发生如此悲剧，关键确实如你所说，是何FC介绍所谓樊西曼迫害工农老干部，使你顺着就上了道。记得你在座谈时说过“一沾上黑线，就认为是黑帮了”。那个时代，没有法，没有对人的命运的一点点认真，一句话就随意地把人划到敌人类去；特别是被鼓动起的青少年的轻狂，较劲，使你一方面说在“查黑线”，其实内心已经轻易地下了结论，认定樊西曼是黑帮了，所以你敢去她家造反、“查黑线”。你也说了一句“认为她是黑帮，要不怎么敢去她家！”

当年红卫兵以对联划线，反对对联的就是反对红卫兵。反对者中出身红五类且抓不出毛病的，红卫兵也基本不能怎么样；而对家庭抓出问题的，就找到治他的理由和办法了，尽可以凭对联从气势上甚至心理上压住他。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你和曹滨海辩论，去曹滨海家造反“抓黑线”，就顺理成章了。尽管你对对联、对抄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中了招，入了道儿。

由此我们更痛恨文革。

时间紧，考虑不周全不深刻。你有什么想法，不同意见，愿闻其详。

5.2 大会堂演出，使我忧虑，更感到匹夫有责。

### 陈涵实的回信 1:

季烨：你好！

感谢你的分析，我认为很有道理！既然下了决心要反思，要悔罪就要彻底，没有什么面子上挂不住和心里别扭的。我已经是古稀之年，再不悔过就来不及了！

当年在文革初期我的脑子里面十分混乱，什么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什么“二月兵变”……所有这一切一切宣传都让我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不知道中国经营了十几年怎么竟然会达到这样地步。因为毛林的支持，认为红卫兵所做的一切至少方向和路线都是正确的。所以千方百计地维护红卫兵的名誉，有时候哪怕是违心的也硬着头皮去做。因为林彪说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更全面，我同意阁下的意见，就按照你分析写吧。

最近 5.2 事件和微信中为×××和四人帮（主要是江青）叫好的文章铺天盖地的涌现，让我更加感到彻底反十年思动乱和揭露文革是非常必要，尽管……但是善良的人性和正义感已经在绝大多数人心中苏醒，为自己的错误遮掩就是继续保护灭绝人性的文革！

### 陈涵实回信 2:

季烨，你好！

仔细回忆并分析了一下，有以下问题请你斧正。

8.24 到曹滨海家是想查出一条黑线，为毛的革命路线立功。“八二五”去曹滨海纯粹是应邀去吵架，说好听一些就是大辩论，实质上是在怀疑樊西曼有问题的时候去仗势欺人。

每个人在当时所在的角度不同，现在涉及的个人面子问题也不一样，自然看法也不会一样，……因此建议你尽管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编写关于“八二五”惨案，不必考虑到我这个当事者的想法和面子。如果一个人真的彻底地忏悔过去的所作所为，那么就不应该在乎大家的评价和报道。也许若干年后说不定我还会有更新的认识呢！


## 六、于芳民信 2

一、“八二五”事件经过我们班众位同学的共同回忆，基本还原了时间的原貌。我感觉，大家真是本着尊重事实，敢于解剖自我的态度而相互交流，逐步拼出事件的总貌。尤其是陈涵实的态度，令人感动。

陈涵实在班里原来是老大哥的形象，对同学都挺和蔼可亲。我和他都坐后边，又都好玩乐器，接触较多。但成立红卫兵后，我感觉他突然大变，我一直不解，也没机会和他直接交流，借这次机会说说挺好。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他那种想抓上线积极革命的心态正是他当时那种表现的原因。

我相信他当时不赞成血统论，但当时他在学校操场组织上百红卫兵小将，唱血统论对联歌的场景真让人感觉他是积极的鼓吹者。这正是那段时间的反常现象。几乎每人都为表现自己革命做了不少违心的事，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二、正因为如此，才更值得总结反思那段历史，为什么使人产生那些变化和表现。

我们无意成了重要事件的当事人，但我们现在应该有意识的进行总结反思，以对历史，对逝者，对后代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 【附录】

## 我的同学曹滨海

## AI 国家

曹滨海，奇人也。外憨内秀，口讷少言。文静如处子，手无缚鸡力。简单动作以为难，体育是其短[1]。常冥思苦想，又特立独行。以背诵《俄汉词典》为学俄语捷径，以《一件小事》作文名扬全班[2]。习练书法，日日不辍，每至课间，必端坐书桌前，手握蘸水笔单写一“永”字，一笔一划，认真至极，但见满纸皆永字。众人讪笑之，亦不改初衷。殊不知，永字八笔乃书法入门之道也。

曹天赋异禀，难为世容。偶出惊人之语，必视为异端邪说。虽贵为高干之后，却树为修正主义典型[3]。

文革潮起，妖风满城，曹奋起反抗，以暴制暴，血溅北太平庄，文弱书生竟成血性男儿！壮哉！放眼班内班外，任你官高爵显，能史册留名者，唯曹氏滨海！与之对应的，仅是一个“被砍伤的红卫兵”。岂非张飞之于督邮乎？

人可欺天，天不欺人！

[1] 曹为班里男生个子最高者，体育却极糟。不要说跳箱，就连那种“山羊”也跳不过。

[2] 曹曾仿鲁迅写一篇《一件小事》作文，具体内容忘记。因其格调不高（不是口号式），语言晦涩（有些曲笔），心理灰暗（真实感受），而受到批判。

[3] 文革前，本班班主任曾有班内“四大尖子”之说，即四位同学分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尖子、修正主义尖子、教条主义尖子、封建复古主义尖子。曹为修正主义尖子。🔒

2016.05.16

【附录】

## 曹滨海最后的身影

—

“八二五”事件当天，曹滨海被警察带走。高二 1 班同学朱今天、同学 A、冷允法、杨文久等同学当年末即积极参与促其出狱的活动。

于海宁：

1966 年底，在为曹滨海伸张的过程当中一直积极参与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学。

朱今天：

1966 年末，老红卫兵被称为反动路线受到批判，曹滨海事件有了转机。“八二五”那天还发生了李文波事件，周恩来 8 月 26 日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的讲话只说“坏人砍伤了红卫兵”，要保护红卫兵，没提有人被打死，所以红卫兵就掀起了更大的红色恐怖来报复“阶级敌人的反扑”。

9 月 10 日，周恩来明确说是“两部分学生发生了冲突（师大二附中）刺了一个学生，你们要开十万人公审大会，搞到中央，我们不同意开，……”说明中央没有对曹滨海进行政治定性。

周 8.26、9.10 的讲话都有记载，我还有当年油印的材料。

由铁道部党校牵头我们几个同学在滕代远家见到曹滨海的姐姐曹××，大妹妹曹××，具体还有谁在，我记不清了。谁通知的也记不清了。见面的目的是为了曹滨海尽早出狱。随后没几天，我和同学 A 等去了陶然亭附近半步桥第一看守所，这里原来习惯被称为第一监狱。

同学 ZH：

甄革新同学记得也去过半步桥看守所看曹滨海，但是没有见到。

朱今天：

看守所看到的曹滨海很平静，没怎么说话，但能感觉到精神正常。可能见阳光少，比原来白净，更短的刺头。

我提出曹滨海的刑事案件应该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该继续关押，狱方说：“我们不把他关起来，他还能活下来吗？早被打死了！”“康生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曹滨海在这里面有的时候会表现出精神不正常，不是经常的，抢过别人的馒头”，“没告诉他他妈死了。”

同学 A：

我觉得当时不能算“营救”，只是到公安机关探寻，得到的回应是定性为“激怒伤人”。  
朱今天：

总的印象，我觉得狱方没把他当“坏人”，事实上他也是按无罪释放的，没有判决书，应该是上边的决定。

有位知情的同学说：

樊西曼被打死后，周总理十分痛心！也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016年5月底，在纪念新四军七师成立75周年暨杜大公、樊西曼等六位老革命百年诞辰纪念会文册上，看到樊西曼女士的三位女儿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五十年对妈妈的深切怀念》中说：

8月25日她永远离开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听闻这个噩耗，也十分痛心，表示樊西曼同志是铁路系统的第一个女局长，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不幸牺牲啊！

妈妈离去后，铁道部党组织给予我们姐妹兄弟极大的保护和安置。

## 二

可以确切知道，从监狱里放出来后，曹滨海被安排到青岛四方机车制造厂，想来是让他

躲开红卫兵报复。后来调回北京，据说在南口机车车辆厂。

朱今天：

曹滨海哪天（从监狱里）出来的，二附中的人不知道，应该是他爸爸接出来的，当时曹滨海的两个妹妹还未成年，他姐姐在外地。

尹平：

记得曹滨海从监狱里出来后还和我们见过一次，在67年冬天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和洪忠是肯定在场的，洪忠给我来电，肯定这事。其他还有谁？乔治海？李仲宁？见面的地点在哪？我印象中总觉得是在甄革新家，因为就他家有地儿！又没大人。谈了什么？我能记得起来的，只有他目前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当学徒工。印象中他还面带微笑，谈吐正常。

于海宁：

沈伯威说过，初中同学张雨顺文革中作为军代表在青岛四方厂见过曹滨海。

朱今天：

曹滨海从青岛调回北京是他爸爸的要求。

高杰：

曹滨海和我初中高中都是同学。大概是7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火车站见过曹滨海，我乘坐59次北京至长春的火车回铁岭看爷爷奶奶，我坐在火车上，窗外有人叫我，一扭头就看到曹滨海，他是来送他一个当兵的朋友，他还介绍我们认识……当时曹滨海很正常，人也很精神，感觉不到曾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

### 三

他后来想的是什么？

高二3 XLL同学告诉我，七十年代中前期，她在东单潘××家门口看见过曹滨海。

潘××当时是铁道部军管会的主要领导。潘家的女儿说，你进门时看见大门口站着的

那个疯子了吗？他妈妈是铁道党校的书记，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了，他常在我家门口站着，要求给他妈妈平反。XLL问，他是不是叫曹滨海，得到确认后，便把“八二五”的情况告诉了她。离开潘家，曹滨海已经不见了。

XLL同学说：我在学校时不认识曹滨海，就只见过这一面，他个子挺高，黑瘦，默默地，呆呆的站在那里的样子，至今不忘。

母亲是他心头永远的痛！他能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妈妈的冤案得到了昭雪。”（《五十年对妈妈的深切怀念》）1980年，樊西曼正式平反。随后，何FC夫妇因向二附中红卫兵散布樊西曼材料致其惨死而受到党内处分。

除了母亲，他还想到什么呢？

曹滨海高中班主任厉益森老师对我说：“80年代初期，我在二附中当书记，曹滨海来看我。他没有提“八二五”的事，我也就没有提。他精神状态不太好，身体也非常衰弱的样子，瘦弱。对我说“厉老师，我来看看您。”可能是在南口车辆厂的时候吧。”

这大概是二附中师生最后见到的曹滨海的身影了。

## 四

曹滨海最后是怎么走的？发生在哪一年？


据说曹滨海后来从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调入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后来出了事故，被厂里火车压死了。是自杀还是真事故？至今无人知晓。大家多猜想是自杀，那几天，是他妈妈忌日前后。

直至2016年2月召开“回顾与反思”座谈会时，才由朱今天同学通过各种渠道追究清楚：1985年，曹滨海37岁时。其他的也问不出来了，他的家人太怕提起这段家破人亡的惨剧，伤害至今。

2016年5月间，朱今天去南口机车车辆厂，希望能了解曹滨海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生

活及心理状况，但工厂档案里没有这个人，找了两个老职工询问也不知道有曹滨海这个人，他们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如果有，我们哪能没印象？（去南口派出所）南口派出所没有曹滨海销户口记载，户籍警说：除非他的户口不在我这，我们的档案是不会销毁的。

2017年，我听说女附中同学李本和、首师大合唱团歌友张淑萍都是六七十年代之交进入南口机车车辆厂的老人，遂向她们了解曹滨海事故情况，她们均没听说过这事。

他究竟怎么走的？他的坟墓在哪里？我们的这束鲜花，只能永远为他摆放在心里。 

## 【附录】

### 陈涵实给班里一位同学的信


2016/3/6

1. 我在文革初期对抄家破四旧不感兴趣，同时认为一个中学校长和党支部不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基层堡垒。只是一心想抓一条黑线，报效毛和党的恩情，眼睛总是往上看，于是在铁道部党校的问题进入视线范围以后，总想查清楚。

2. 没想到曹滨海是个值得同情的单亲家庭，和母亲共同生活很多年，对母亲感情非常深。母亲在人们心中是神圣的，不能够触动的。我去审问樊西曼对曹的伤害是巨大的，不可原谅的，这两刀也是罪有应得。

3. 只是没有想到最后株连了樊西曼、姜培良和靳正宇老师，也没想到引起更多的批斗殴打老师。

4. 第一把火是我点起来的，我承认我罪不容恕，任何悔过和道歉都不能挽救我造成的损失。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还原那段历史真面目，让后来人不再重复我们的悲剧。

5. 我不想推卸我在这个悲剧中的责任，我愿意直面大家的质问，必须把文革这场中国空前的灾难原原本本地复原，这是经过文革的每个人的历史责任，是对后来人的负责。 

## 第二章 樊西曼，众目睽睽下的虐杀

—



网友南郭吹竽客写道：

当年我父亲在铁道部党校工作，……樊西曼女士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平时非常朴素，平易近人，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她的儿女也都非常有教养。

首师大文学院教授 HXQ

樊西曼在党校口碑非常好。记得有一次在院里看见一个中年妇女，衣着打扮就跟农村妇女一样，我父亲对我说：这就是党校副（樊西曼旧照）书记樊西曼。

**ZXH 同学（初三四班）**

樊西曼是新四军我父母革命老战友，战功显赫，樊西曼在新四军里威望很高！她当年是周总理亲自任命的铁道部第一位女局长。

**朱春江（高三二班同学）**

樊西曼 13 级高干，我妈的老战友，人特好。

**杨叶璇（曹滨海小学初中同学）**

我跟曹滨海是发小。我父母在铁道部党校工作多年，曹母是我妈所在部门党委书记，我们住同栋家属楼，我与他同一课外学习小组，常到他家做功课、吃饭。他母亲高挑、漂亮、睿智、和蔼。

网友南郭吹竽客写道：

当年我父亲在铁道部党校工作，党校的人对樊西曼书记竟然被二附中的暴徒打死非常震惊。那天我放学回来经过她家楼下，亲眼看到有人从她家窗户里往外扔东西，然后放火焚烧。她的小女儿是我们学校初中的同学，当时就在旁边呆呆地站着，那可怜的情景至今

还历历在目。……二附中的那帮打人的家伙，简直就是一群畜牲！

## 二

刘绮菲（文科班同学）：

清楚记得，那天特恐怖，广播喇叭里突然响起“杀人啦！杀人啦！”的叫喊声特吓人，看到楼下一帮人连推搡带打地把樊西曼推进学校。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樊西曼，就看见一个中年女的，连滚带爬地跌着跟头给推搡进来。

殷枚（高一二班学生）

打樊西曼时，我和一个同学正在教室里，被我们班红卫兵撵到现场，看到结尾。

朱元同学：

当时很多同学已经不来学校了，气氛已经很恐怖了。我们班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被迫来校，那天正在教室，就听见广播里连续几次催促“革命师生们”，马上全部到礼堂前（乒乓球台）集合，批判姜培良！是谁广播的忘记了，但催促得很急，口气厉害，非常恐怖。我知道自己去没有好果子吃，没去。

××老师：

打樊西曼的时候，强迫老师们去看。记得先让××同学（文革前党支部已讨论通过入党）读樊西曼给曹滨海的信，读了一半不让读了，因为都是革命的内容，改由×××同学（文革前党支部已讨论通过入党）读，×××也读不下去了……

栗卫民

“八二五”打人时候，乒乓台上，打樊西曼，李WL（红卫兵领导之一），还有一小女孩，我不认识。军训团有文字材料，李WL是主要打手的材料，班里写过东西。

胡启新：

那天樊西曼被打也是在乒乓球台上先批斗了极短时间，老兵觉得不解气，上去就打，



说要她为儿子的事负责任、偿命。不到十分钟，樊就倒下了。俯卧。老兵轮番打，初二五虎（五个女老兵）打得很卖力，文科班刘男（忘记名字了，校投掷队的，虎头肌极为漂亮）打得力很大，得到喝彩。在附近的L满脸涨红，旁边的女老兵把一条皮带递给她，说考验她觉悟和阶级感情的时候到了。她就奋力地打。樊西曼一声不吭，慢慢地不动了。有人说她装死。衣服打烂，内衣露了出来。血肉模糊。打人至少有两个小时。

### 李××同学

红卫兵逼着L打，喊“你还是工人出身哪，你的阶级感情上哪去了？！”L一边哭着，拿鞭子打了两下。

### 王贝贝

我被红卫兵逼着下楼去看打樊西曼，眼看着樊衣裤被抽破，露出内衣来……

### 李××等在场的很多同学：

打樊西曼，眼看着鞭子抽下去，体液隔着衣服渗出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 杜平老师：

打的时候，樊西曼一声不吭。

### 朱今天同学

听初三LSZ同学讲述：

“八二五”那天，他作为出身有问题的学生被强制观看打杀人的全过程。

樊西曼被拉到学校，一开始还分辩了几句，后来在被殴打过程中，直到死，一声不吭。

李NN（红卫兵主要领导之一）上手用武装带的铜扣对樊西曼打的很凶。

有人从食堂大厨房捧来盐撒在樊西曼的伤口上

### ××老师：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红卫兵让贾YY(红卫兵主要领导)打。贾YY拎个垒球棒子，那表情，似笑非笑的，好像说，你们看我的。慢慢地举着垒球棒，走进人群里……

### LGH同学说

JYY（红卫兵主要领导）拿绳子抽樊西曼，只抽了几下，她的衣服就破了。LBQ跑去端来的盐。

XXX老师：

清楚记得，（红卫兵主要领导人之一）打樊西曼，打得很凶。

张新同学

红卫兵叫我看打樊西曼。

打樊西曼时候，红卫兵领导人李 NN 上了，我看见了，打了几下，下来了。

XX（高二二同学）：

如果不是红卫兵领导人带头打，不会形成二附中“八二五”暴虐的打人狂潮。

ZHXX（原红卫兵）

那些自己不打，在底下叫贾 YY、李 NN（红卫兵主要领导人）他们打的人特别卑鄙。这种人有。

王骥（初三六学生）


打死姜培良、樊西曼最后最狠的包括初三的刘XX等

黄植荣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

“八二五”根本不敢看，后来出去，他们打完了，看见往外拉樊西曼，可能已经死了，衣服全打烂了，臭袜子塞在嘴里

网友雪的人儿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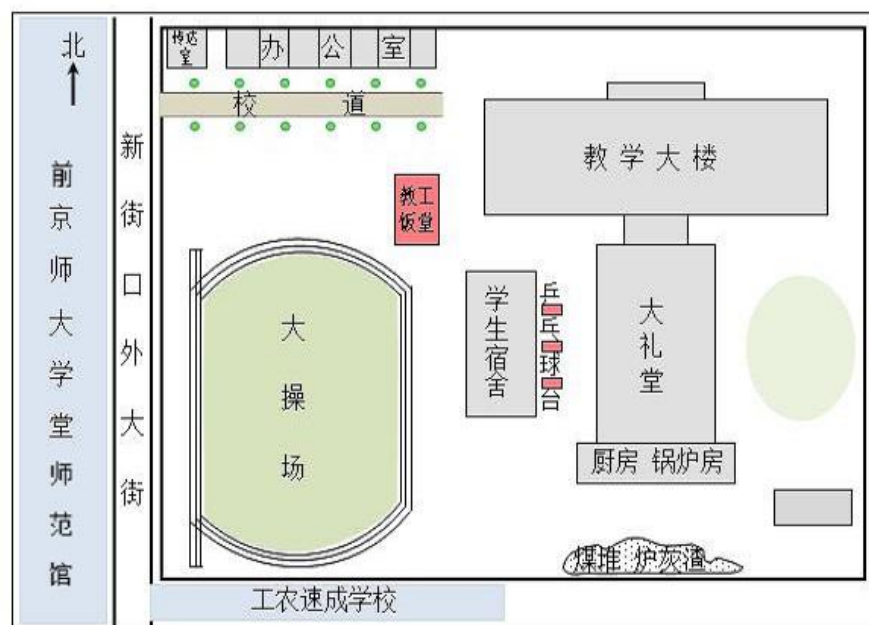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一群孩子在我家居住的北师大四合院跳皮筋，樊书记女儿樊小曼带着姜书记的儿子小雄也在这里玩儿……后来，住在东斋西楼二附中的资料员老陈阿姨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们这些傻孩子，学校那边儿都打死人了……”

这两个快乐的小朋友就这样，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父母……

## 【附录】

## 我所见到的““八二五””

## AI 国家



1966年8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二附中校园内热火朝天，到处贴满大字报，揭批校领导和老师，抓黑线斗黑帮，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25日，我与本班几个什么派也不是的同学正在学生宿舍（三楼或四楼？）里无所事事。忽然传来“狗崽子曹滨海刀砍红卫兵头目”的惊人消息。一时间，学校沸腾了，红卫兵们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许多细节现在已记不清，只记得人们聚集在乒乓球台（砖垒水泥砌）四周，人声鼎沸，野蛮打人。当时，我已经吓蒙了，不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不敢下楼，楼下都是已处于疯癫状态的红卫兵。只能从楼上宿舍的窗口偷偷往下不时观望几眼。只见红卫兵们正在乒乓球台上轮流打人，喊打声、怒吼声、惨叫声响彻校园，人声、广播声、棍棒声混成一团。据我所见，打人最力者（至今不知此生姓名和下落）乃是一位彪形小伙

（身型极似港星洪金宝）。此牲站稳马步，棒子抡圆，浑身用力，棒落如风驰电掣，围观者一片片叫好声声。不可思议的是，此牲竟面带微笑，洋洋自得状。

喧嚣很长时间后，打人才结束，稍事平静。这时我才敢下楼，当时并不知打死了人。我想出校门，途经教工饭堂，偷偷望去，里面有数十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当时尊称为牛鬼蛇神），一排排、一列列，面南而跪。上身赤裸，浑身湿透，亦汗亦水。有红卫兵穿梭其间，大声喝骂。棍子打、皮带抽，或拳脚相加，牛鬼蛇神们惨叫声、嚎哭声，震耳欲聋。一股股浓烈的人肉味，夹杂着汗液屎尿和血腥气冲门而出！从来没闻过这么刺鼻的怪味，令人胆战心惊，至今难忘。

我不敢久停，急忙出了校门，竟去到了曹滨海家楼下，此时好像已近傍晚。我记得在曹家楼下，三个女孩（曹滨海只有两个妹妹，不知为什么我记忆中是三个女孩）站成一排，呆呆的立着，面无表情。曹的大妹也就初中，发育尚未成熟，长胳膊长腿，一头浓密的黑发。女孩长得都极像曹滨海，前铲头，尖下巴。当时无人敢上前抚慰曹氏姐妹，那种孤苦无助的凄惨场景至今记忆犹新。似有红卫兵在看守，另有红卫兵们在曹家楼道进进出出，正在把曹家扫地出门。我停留的时间不长。红卫兵抄烧曹家财物也许在我走后。

这正是：“教工饭堂人成鬼，乒乓球台上血如泉”。

公元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大二附中：

黑暗过黑暗的旧社会；

血腥过血腥的渣滓洞；

纳粹过纳粹的集中营；

残暴过残暴的历史上有名的暴政。

## 师大二附中“八二五”事件

杨大同

我是1965年高中才来到二附中的，不到一年时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旦回忆起二附中，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尤其是1966年8月25日那个黑色的下午，我们学校的学生一下子打死了三个人（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教语文的男老师靳正宇和一名学生的母亲樊西曼）。樊西曼之死是我亲眼所见。一个十六岁花季少女，亲历过那种场面真是刻骨铭心。这个阴影每每忆起不寒而栗。我感到，那个时代，那样的愚民教育，那样的个人崇拜，革命化教育，让我们变得偏执、狂热、屈辱、仇恨，难以释怀。这样的素质教育好吗？

历史是怎样的？那个黑色的八月二十五日我们能忘记吗？

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炎炎夏日，文革也进入如火如荼的疯狂时期，当时最时髦的流行词是：“红色恐怖万岁！”那天下午大约两点，我正在女生四楼宿舍，突然听得楼道一片混乱，有人在喊：“都到楼下集合，开批斗会！”“有人杀红卫兵了！”什么？红色恐怖期间只有红卫兵可以随意杀人，杀红卫兵？吃了豹子胆！我也随着人流冲出了宿舍楼。只见楼下东侧的乒乓球台周围聚拢了许多学生，人越聚越多。四十米长的宿舍楼与对面的学生食堂兼礼堂之间形成了一片小广场，中间排列着四五个水泥乒乓球台，每个台上都站满了人，像是舞台又是制高点。球台周围黑压压一片，挤满了师生。我自知出身不好，在班里属于被孤立对象，别说加入红卫兵没资格，就连红外围组织“七一”里的同学也没人愿意搭理我。我偏又不甘寂寞，总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间这一部活书。于是我站在食堂外柳树下，和几个看热闹的厨师们凑在一起观望。舞台中心在一个乒乓球台上，几个红卫兵押着一名中年妇女，她中等身材，短发，被按着头，看不清面容，上穿一件深蓝色人造棉短袖上衣。押解的红卫兵，只记得一个高二女生王×，还有一个高三男生李w1，他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宣布“女犯”的罪行。“罪人”叫樊西曼，就是杀红卫兵“凶手”的母亲，“杀人犯”叫曹滨海，是我校高二的一名男生，已被公安机关收押。被刀砍伤的也是他的同班同学，一名男生，红卫兵小头目，叫陈涵实，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发后，红卫兵们把曹的母亲从牛棚中揪来学校批斗。原因是，他们在抄家时搜出了母亲给孩子的一封信，

认为是曹母教唆所为。不知什么时候，樊西曼已经跪在乒乓球台上，批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人也越聚越多，大概有几百名师生。台上在念那封“黑信”，母亲写给儿子的信。母亲的信是写自牛棚的，她原任铁道部党校的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从四清工作队回单位接受审查，被隔离关押之中给儿子写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她目前的处境让儿子放心，让儿子相信党相信群众，要理解文化大革命，要经得住考验。

按正常思维听，这信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话被曲解成黑话，没有颠倒不了的黑白，没有批判不了的文字。总之 认定，就是这封信导致了儿子曹滨海砍杀红卫兵，她就是教唆犯，就是罪魁祸首，就得替子偿命！批判声中，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打倒走资派樊西曼！”“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反革命曹滨海！”台上批判樊西曼的学生怀着浓厚的阶级感情，像红色娘子军女奴们斗争地主南霸天，控诉得声泪俱下，听的人更是群情激奋，樊西曼简直就是一条十恶不赦的毒蛇！红卫兵先是推搡，后是拳头，揪她的头发，打她的脸。女红卫兵王×终于按捺不住她那高涨的革命激情，一脚将樊西曼踢下了乒乓球台，淹没在人群中。我已经看不见樊西曼的身影，只能看到有人抡着沾水的皮带不停地抽打，后来又挥舞着一根一人多高的木棍，胳膊样粗细，像是房顶上的旧木椽，像舂米一样的垂直往下夯。一下一下，一个人累了，马上有人争先恐后的接班。每夯一下，围观的同学们就齐声大喝一声：“好！”就像喊劳动号子一样。每打一下，我的心就揪一下，每听一声，我的心都颤栗一回。我看到我们班的红卫兵D加入其中抡棒，他长得又高又壮正派上用场。有的人流着泪叫好。这真是一个人生的舞台。但是，自始至终我没有听到樊西曼说过一句话，或是呻吟一声。没有见她有丝毫的反抗，像是一块泥，又像是一块布，任人摆布。后来不知是谁说：“她在装死！反革命还在负隅顽抗！”又有人说：“给她泼水、撒盐！”于是人群中让出了一条通往食堂的路，我看到了樊西曼，也许已经是尸体。她平趴在地上，那件深蓝色的上衣已经被打烂，露出了白色的、肿胀的皮肤，和上面条条鲜红的血痕。腿肿胀得像要把裤管撑破。有人从食堂端来一盆冷水泼在她身上，泥水一片，她一动不动；又有人接着往伤口上撒盐，她仍旧一

动不动。夏日的阳光之下，众目睽睽呀！这一幕幕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

突然之间，人群又开始大乱，有人喊：“鹿笃根被抓回来了！”于是人流又开始潮水般向校门方向涌动。我也被裹夹在人流中。当我随着人流跑向校门时，见到被揪住的数学老师鹿笃根。她被剃了阴阳头，一脸的木然。鹿老师五十来岁是个未嫁的老姑娘，长期住在校内教师单身宿舍。不知为什么也进了劳改队，几天前看见她在扫女厕所。听说她出逃到北戴河打算投海自尽，不成想，因为会游泳，求死不成又返回了学校，回归劳改队。

当天晚上，在劳改队里，红卫兵阶级义愤空前高涨，接连打死了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曾任北师大教育系党总支副书记），和高三的一名语文男教师。该教师是一名转业的海军，在部队时因事故致残装着一只假手，上面总是套着一只白手套。教语文的老师被斗的几率最高，课文中难免有一些风花雪月的内容，被说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文革中就上升为毒害青少年。为此高三的学生贴过他的大字报，于是被抓进劳改队。他死后，有人在校园的杂草垃圾堆中看见过那只被丢弃的白色假手。

事后，在断断续续的传闻中我才得知，被打死的樊西曼，曾经是新四军女干部，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党的十一级高级干部。前夫是少将，当时任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当时该校属军事院校）。曾于五十年代初领军赴朝，……樊西曼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儿子曹滨海虽是干部子弟，但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对文革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曾经贴出不同政见的大字报。被砍的陈涵实是他的同班同学，又是红卫兵激进分子，与曹时有争执。这次居然带人到曹家抄家。曹滨海自恃革干子弟，无所畏惧，挡在门口不让进门。争执之下曹拿起菜刀砍向陈涵实，尽管头部伤情不重，但血流满面，酿成大祸。曹滨海被公安局收押，陈涵实住进了医院，成了“英雄”。

曹家被抄，所有家具什物均被从窗子扔到楼下，一把火烧光。这还不算，又将其母从党校的劳改队揪出，拉到儿子的学校活活打死。这一事件成为轰动京城的“杀红卫兵血案”。当天傍晚，我看到北师大的造反团头目谭厚兰，带一伙人到二附中游行声援。当夜他们串联全市红卫兵，筹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曹滨海，掀起又一红色恐怖新高

潮。据说周总理闻讯后，紧急接见红卫兵代表，通宵谈话，才制止了更大的行动。

据说曹滨海在狱中终致精神失常。打死他母亲的那些人，王×始终神经兮兮，提心吊胆过日子，随时准备有人来寻仇，从不敢见旧日同学。李××曾被铁道部党校追究打死樊西曼的责任，因李年轻，又是乱棍打死，也就不了了之。（王谦、李瓦林）

不想，四十多年过去了，十六岁时经历的一幕仍活灵活现。试想，我一个小小的旁观者尚且念念不忘，何况那么多当事人：害人的与被害的，叫好的与旁观的，推波助澜的与点头哈腰的，回首往事会没有心灵创伤？人权和法律何在？樊西曼，一个为共产党打天下的新四军战士，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当她还是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而投身革命时，万不会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弃儿。今天以包容和理解来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历史不容割裂，它应该带给我们反思！这样才能清醒，让历史不再重演，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向着和谐轻装前进。🔥

### 第三章 姜书记的最后一刻



1966年8月25日，继樊西曼被打死之后，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同志被一些红卫兵以及个别非红卫兵的暴虐分子打死。青年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内脏全部打烂，吐血一二天内死去。副校长高云被打昏死，“捡了一条命”（自语）。教导主任厉益森说：“我就差一口气，否则我就是第四个（被打死的）了！”

—

二附中田滨老师的丈夫赵文滔在其回忆录《伤害》中记述了师大二附中红卫兵打死姜培良的细节：



打死樊西曼后……也许是打得一时兴起，接着把学校书记姜培良、副校长高云及语文老师靳正宇拉到小食堂，并且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宣布了几句他们的罪状后，一时间皮带的啪、啪的抽打声，打人者的骂声，被打者呻吟声、惨叫声，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一阵雨点般密集的皮带抽打后，（姜培良）书记、校长和一个教师已经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红卫兵说他们是装死，用冷水泼在他们头上、脸上。此时，还有人从食堂拿了盐撒在他们身上。

据说有人曾吩咐说：“高云有高血压，注意点。姜培良没事，他身体好。”其结果是，“注意点”的，被打昏死，而“身体好”“没事”的姜书记被施暴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据说折磨到最后，死去活来中，惨叫声中传来姜书记微弱的呻吟：“小爷爷们，别打了……”“……我是黑帮……”

**金天相老师：**

“八二五”那天把我们都带进（劳改队里）去，进去就看见他们倒在地上，几乎全倒在地上了，满地是水。打时惨叫声，我们害怕，哆哩哆嗦的，也不敢看。偶尔看一眼。蔡××（教师，党员）一直在喊“打倒走资派！”后来老师们都不怎么理她。

**崔胤奎老师：**

打死姜培良的时候，有青年教师蔡××带着学生喊口号：“打死他！打死他！”

**厉益森老师：**

教师打人？不知道。喊口号的有，蔡××，“八二五”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初三LSZ同学：**

斗姜培良是在离校门口不远的劳改队，让姜培良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用木枪戳，直到他被摔下来。

**陈天感同学：**

姜书记死前凄厉的哀嚎声，绝不是一般的叫声，没法形容，至今在我耳边响……太可怕了！我只听到声音，不让进去看。据说，红卫兵把两个板凳一正一反摆着，让他坐，那

怎么坐？！红卫兵一踹凳子，他猛摔下来……红卫兵拿练刺杀的枪托鎚他……那声音，不是叫声，肯定的打得太厉害了，太惨了，太可怕了！

高一1芮卫平同学说：

那天打樊西曼实在不忍看下去，我跑到校门口坐着，这时姜培良爱人来了，我不让她进去，我说里面正在打人你进去干吗？她喊：我进去收尸啊！不幸一语成谶。

我追问当年被关“劳改队”的厉益森老师和其他老师：

“姜培良到底是哪些人打死的？”

和樊西曼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被打死的不同，姜培良是在劳改队（小食堂）的封闭环境里被打死的，在场的除打人者，就只有被毒打的“牛鬼蛇神”和被迫跪在周围的教师。

厉益森老师说：

“群殴。这拨打完了那拨打。”

各种渠道都指向高中的某几个人和一些初中红卫兵，但最终到底是哪几个人打的？什么情况？不知道此生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拷问灵魂出来揭示真相真诚道歉？

## 二

关于姜培良的最后一刻，《伤害》一书是这样描述的：

后来有人说：“姜培良不行了，搞一辆三轮车来，把他拉到医院！”据说，三轮车在拉往医院的路上，有学生说他装死，边走边打，还没到医院，姜培良就完全停止了呼吸。

田滨老师当时没有在场，她是第二天到校时知道头天的惨状的。但她爱人的叙述和我了解的基本一致。不过关于姜书记的最后一刻，我听到了一个细节：据说姜培良书记被残酷施暴，快断气时，跪在旁边的“牛鬼蛇神”队里的白胜喜给他做了人工呼吸。

我去看望白胜喜老师时，向他求证。白老师说：“打死姜培良的时候，红卫兵那边有人喊说‘谁会做人工呼吸？给他做做。’当时我也没多想，就举手说‘我会’。看着姜培良的样子，那时候我也不去想死活的问题了，今天死不了今天就活着。姜培良人挺好的，我得救他。”

白老师当过志愿军，想来是在部队学会做人工呼吸的。红卫兵就让白老师给姜书记做人工呼吸。“他们让我给做。我做了半小时还是40分钟也说不清楚了。我怎么做他都没缓过气儿来，我就说：‘不行，我做的不行，还是送医院吧。’

“红卫兵说：‘你说送医院，那就你送吧。’他们让我一个人送。我拉来辆平板三轮，把姜培良抱上车，拉到262医院旁边一个医院的分部，挺好的医院，送到急诊科。”

有人说，这个医院是北医四院（北京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红八月”时，医院的大夫们对救治“牛鬼蛇神”，有的是畏惧，怕带来麻烦；有的大夫本身就左，不愿意救。白老师说：“我把姜培良送进急诊科，让他们急救。我也不知道他们急救了没有。姜培良死了。”

姜培良已经死了，一个红卫兵（？）来了，手里拿个棒子，鞭尸。

“鞭尸”这两个字白老师说得特别缓慢，沉重。

“他还是普通的家庭出身。”

这个名字白老师能想起来，但他没说。据我后来了解，是高三1张××，红卫兵外围组织“红战友”总负责人。

鞭尸的这个人，打死姜培良的这些人，这几十年来，难道他们真能忘得了自己的罪行？他们亲手制造的姜培良被打死时的种种惨状能不出现在他们的梦境中吗？当人生一步步走向尽头的时候，良心能不煎熬？在后悔与怨恨中，他们是不是会深入地想想，是什么使他们，这些年轻甚至年少的人，突然之间人性骤灭，变成禽兽？！

## 三

崔胤奎老师说：

我跟姜培良一起抬筐，我总让他一肩，我年轻嘛。我看他总用一个肩抬，就说：你干嘛总用一个肩呢，你换换肩呗。他说“你不知道，穿着衣服看不出来，这个肩打坏了。”

厉益森老师说：

姜培良死以前，和我一起干活攥煤球时（拔草？）说：想不通，怎么昨天还在积极要求入党，突然就变成这样了？！王杰想逃跑，姜培良还劝他别跑，说：你有家庭，你跑了家里怎么办？姜培良从来没有想过死。他很坚定，说过好几次：“我活着要见毛主席，死了要见马克思。”

栗为民同学说：

我见了姜培良最后一面，第二天他就死了。那天我赶到学校，就看见姜书记被红卫兵押着走。那时他还能走，还认识我。我站那看他，他认出我了，挤出一丝笑，当然很难看，我都现在都忘不了。（季烨问：“他那时清醒吗？你怎么知道他认出你了？”）

他那时候神智已经不是很清了，快失常了，看见我，眼睛一亮，认出我来了。我是被帮助的重点。我因为字不好，又顶撞老师“马克思的字也不好”。全校一大会上姜培良批我：“你有什么资格和马克思比？！”让我每天写一篇大字一篇小字交给他。高二第二学期，整一个学期，我每天都到他办公室去，进去鞠一躬，叫一声“姜先生”，也不说话，交给他。所以我跟姜培良非常熟。

ZHXX 同学(老红卫兵)：

打死姜培良他们当天，在小食堂，我进去看他们在打，就出去了。小食堂外站着一个成年人，我不认识，我觉得不像咱们学校的老师。要是咱们学校老师我总还见过。他看见我从小食堂出来，可能觉得我还能说上话，就对我说：“同学，你进去跟他们说一下，适可而止，别出人命！”我就进去了，对他们说：“行了，休息一下吧。”他们就歇了。后

来大概是又拖到劳改队打死的。（注：该同学在谈其他问题时曾谈观点：文革中，好像乱，其实国家和共产党是有力地控制局面的。）

厉益森老师：

姜培良被打死后，新市委把他家人保护起来，紧急转移了。

陈天感同学：

姜书记被打死后，红卫兵到他家抄家，扬言要斩草除根！幸亏上面发话，紧急把他家人转移了。红卫兵照抄不误，把他家被子都撕成一条一条的，连他家筷子都撅断了，以此表现斩草除根。据说，西城教育局文革后，为姜培良、女三中书记等三位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领导开过会，平反。

赵炳智同学 2014 年 7 月报告姜培良家人近况：

近日，根据 LYX(第一届文科班同学)提供的线索，我与河北省涞源县地税局取得了联系，通过局办公室和人事部门找到了姜书记大儿子姜语迟爱人陈和淑的电话，经与陈通话得知：姜书记老伴早已去世；姜语迟三年前患癌症去世；姜语迟的弟弟姜小京曾到涞源县看望过哥嫂，但没有留下地址电话；姜语迟的妹妹经常出国，去年还到涞源看望过嫂子，只住了一宿，没有留下地址电话。

有人说，姜书记的小儿子小时候发高烧没时间带他去看病，就在凉水里站着，致大脑受伤害；有说他小时候受父亲惨死的刺激，精神不正常。

姜培良书记家破人亡。

【附录】

## 姜培良阶级斗争教育之果

张 新

文革前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原是北师大教育系的干部，到二附中任职后很想在教

育事业中有一番作为，三届文科试验班和一届理科试验班走在了北京市高中教育改革的前列。他紧跟党的最新精神，大抓学生的思想教育。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潮的裹挟下，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的阶级感情教育，出现了施教者未曾想到的恶果。在不久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八二五”事件”当天，姜培良书记、靳正宇老师以及铁道部党校书记樊西曼，被带着“阶级仇恨”的学生殴打致死。

我们应该从中认识到规律性的东西。姜培良那几年推行的极左的思想教育，鼓动起学生中的阶级仇恨情绪，碰上机会就发作。

文科班到房山县坨里公社学农，回来在全校作报告，讲农村忆苦思甜斗地主，农民激情中上台痛打地主，使台下的文科班同学“受到很大教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台上打地主，底下就理解成农民的阶级感情深，对敌人必须狠斗，传达了这种意识：对阶级敌人，你愤怒了就可以打人，工作队不管，现场喊口号“打倒×××！”“翻身不忘阶级苦！”。狠才说明阶级感情深。这是潜化的极左。这样的报告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文科班极左的各种做法，还在全校推广。在学生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也给文革中血统论的泛滥打下基础。阶级社会长期存在，血统论才有市场。例如推崇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就认为，除了他们红五类以外都是阶级敌人。

指导理论的暴力倾向，使得社会沉渣泛起——如西单副食店的那个员工，积极参与破四旧抄家行动，说“我就是想打人”；文革中在“牛鬼蛇神劳改队”打人的多是初二初三的学生；工农出身的打人更凶；初中生比高中生打人厉害。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低年级同学思想简单，易受蛊惑，容易情绪激动，打人比较厉害。也有些平时表现不好的人，想通过运动翻身。


说到底，这是当时主导理论的缺陷，认为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是永恒的。只强调斗争，只强调仇恨，不讲文明。好像越野蛮越先进，越说明阶级感情深。

领导者的思想在掌权前后无差别，掌权前鼓动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奋起反抗，发动农民

参加武装斗争；而掌权后应该引导不同的社会力量走向融合，化解仇恨，但实际做法反而加强了阶级仇恨，让社会矛盾激化，扩大化极端化，最终酿成文革暴力。

姜培良及校领导推行的阶级教育已经把学生的阶级感情调动起来了，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彭罗陆杨的倒台，《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等信息的流传，加上工作组进校后宣布校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信息都告诉学生们：上层领导中也有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学校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上层的反动分子对学生们来讲过于遥远、抽象，有待于通过文革运动逐步揭露。而学校领导近在眼前。学生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自然就转嫁到学校领导和教师身上来了。这就是文革初期北京多所中学校园暴力产生的根源。

作为施教者的姜培良，被自己忠实推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产生的后果迫害致死，这恐怕是他没想到的历史悲剧。

## 【附录】

# 对文科班思想教育工作消极面的 一点粗浅看法

## 一、前提

我认为文科班最成功的经验，一是努力以实验改变国家严重缺乏文科后备人才的状况；二是非常注重文科基础知识的教学，为我们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注重社会实践，开阔眼界，这是文科人才必须具备的素养。

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我们应该看到文科班思想教育的积极成果：培养了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合作意识，个人道德感和自我反省

的修养，严以律己，谦虚谨慎，认真踏实的作风。

三届毕业生人才济济，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奉献，为社会贡献了力量。这和文科班创始人姜培良书记和各位任课老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们向我们敬爱的姜书记、各位老师致敬！

姜培良书记是那个时代好干部的代表，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富于开拓精神，爱学生，清正廉洁，极具个人魅力；为了文科班实验的成功，夙兴夜不寐，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 二、文科班思想工作消极面的主要表现

但是，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确实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文科班办学50年时必须正视的。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反思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

由于当年的地位不同，感受不同，立场不同，今天的处世观念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都不一样，对今天评价文科班形成较大的分歧。分歧不可怕，但不要出现误会。我今天写出我的看法，希望引起大家的争论，各自抒发各自的看法见解，如果能形成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论辩，其实是好事。欢迎对我文观点、材料乃至写法提出批评。

大家都同意，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也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但是我认为，在执行这个“纲”的过程中，程度是有差别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的。以姜培良书记为首的文科班思想教育，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是非常积极的，其方法、形式、组织结构、执行态度等，是有其特殊性甚至是具有独创性的。从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和其他一些学校比较看出，二附中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是相当“左”的。

1. “有成分论”的强化：所有同学包括老师的出身在班里都是公开的秘密，每个人的地位、尤其在发展团员时按出身排队，“出身好”的全部入团后才轮到其他出身同学；在划分阶级出身时宁左勿右；时时刻刻强调“出身不好”的同学身上的“阶级烙印”，强调“深挖阶级根源”，对“出身不好”、甚至是一般职员、中农出身的同学，形成了沉重的



压力。

2. 随时将同学中的思想情况提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思想革命”中暴露出的“私字一闪念”、“原始动机”，必须要深挖其阶级根源，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则更需时刻牢记自己出身的“阶级烙印”，深挖阶级根源。新年联欢有同学表演哑剧《吃年糕》，即被从思想意识上进行批判。到农场劳动睡在地上，一位中农出身的同学只是对把新床单（那个年代农民买条新床单是多大的事！）直接铺在地上稍微有一点迟疑，就被批，从此戴上《阶级分析》中“中农自私不革命”的夹子、身份证。其实这位同学是公认的最忠厚老实无私助人的。

3. “思想革命”人人过关：每周有小组（当时学习解放军称为“班”）会，进行“思想革命”——每次“思想革命”人人都要做自我检查，“暴露思想”、“暴露私字一闪念”。提出“红得透明”——对党对组织绝对坦白，不能藏有任何个人的思想、看法、念头即所谓“私字一闪念”。注意，这种小组会，是周周都要进行的，次次需人人过关。不能讲自己的优点、成绩、收获、进步，只能暴露私字一闪念，谈缺点，找问题。有些同学不愿意过分“暴露思想”，出身没什么问题的被说成“不透明”影响进步，出身不好的则被冠以“心理阴暗”，其政治待遇可想而知。除了常规的小组会外，譬如听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报告，掀起“世界三分之二人民在受苦”“树立世界革命思想”的思想教育高潮，进而人人检查自己；进行社会实践下厂下乡之后或中间，谈收获，最终也落实到检查自己。

4. 大力提倡“做党的驯服工具”，提倡“无条件服从组织”。树立姜书记的绝对权威，姜书记就是党，就是组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有同学清楚记得在我们班黑板上大书7个字——“做党的驯服工具”。当年姜书记为代表的“组织上”给我定了个“资方代理人”的家庭出身，虽然到我们小组蹲点的党支部李文英老师亲口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家庭出身应该是高级职员。”虽然我父亲的单位、我姐姐们的学校、单位都没有给我家划定这个成分，唯独文科班越俎代庖；虽然我心里有想法（出身资本家还是职员，在当时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但因为“听党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

行”，就顺从地接受了。因此，当文革闹起，我就成了“狗崽子”，因为“狗崽子”敢公开表示不同意“对联”，挨骂挨打被批斗被抄家。

5. 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对有异见、性格较为倔强、个性较强或不愿自贬过甚的同学“掐尖打刺儿”。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学信因不同意将他的家庭出身定为资本家，和班主任、姜书记“理论”，从而导致毕业时学校给予诸如“对家庭认识不清、划不清界限”的操行评语，最后导致以北京市文科状元的高分被大学退回的结果。“出身好”的同学中，也有具有独立思想的，或个性较强不十分驯服的，也会被不同程度地掐尖儿打刺。

6. 将人类爱、良善、温情等，上纲为“资产阶级人性论”“中间人物论”；将对美的追求、喜爱斥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低级趣味”。将世界文学名著斥为“大毒草”。有位同学的作文题目是《月光静静地泻在那……》，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姜书记亲自在全排会议上批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梳个辫子照个镜子看个花展买点零食住校带点酱豆腐十五岁女孩穿件小花点点的衣服，都会遭到指责。我因为自己“出身不好”，又看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在“思想革命”过程中，很快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觉得自己“思想复杂”“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不健康”，记得曾经暴露的资产阶级思想之一是“想挂个漂亮窗帘”。某“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看“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时忘记是批判了，被电影感动而情不自禁的掉了眼泪，在班里几乎激起轩然大波，被指为“反动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7. 形成严密的思想工作体系：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亲自深入文科班抓思想工作，党支部书记也轮流到文科班配合工作；每个小组都有老师负责，团小组长每个月必须和小组里每位同学谈一次话；定时召开思想动态会议，每次由老师、干部汇报思想情况后，姜书记直接领导研究，确定下段工作中心；然后由老师——团支部——团小组长——团员——同学，一级一级贯彻下去，掀起一个又一个运动兴奋中心，进行“正面”灌输，配合以全班的“思想革命”，这个高潮，常常以姜书记的讲话来启动。等等。

### 三、后果

当然，这样的思想教育，也有它的积极作用，如本文开头所说：培养了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合作意识，个人道德感和自我反省的修养，严以律己，谦虚谨慎，认真踏实的作风等。另外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有个别同学天生个性极其强悍，越压越强；还有些同学由于出身好等原因，遭受压力较轻，或同时受家庭影响较大，从而促成其积极生活态度。但是，对很大一部分同学来说，其消极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毁损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蓬勃的朝气。“思想革命”是一种强调消极面的形式，违背了教育的重要原则：鼓励，正面教育，浸润，唤起受教育者内心的积极性。尤其对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文科班是自信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两年。16、7岁的孩子，原本是那么单纯，热情，富有朝气，到文科班“思想革命”之后，正如某位“红五类”出身的同学指出的，有些人“像×××、×××（均为出身“非红五类”的团员），被整得像木头人一样”。为什么有些同学不愿参加文科班的任何聚会？有同学“特别不愿意回忆高中那段”；“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不是处在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我本人小学初中都是大队长，活泼，敢干，男孩子一样。但是到文科班一年以后，大家唱歌，让我起个头都不敢了。一辈子缺乏自信心，即使在我较擅长的领域，也不自信。记得王贝贝同学曾多次批评我“不应该妄自菲薄”。一辈子怕在人前谈自己的成绩。当然，这肯定不能全怪文科班的思想教育，我天性中的弱点是基础。但文科班压抑天性的教育恰发生在个性和世界观形成的17岁左右。这是我的宿命吧。

2. 奴隶主义教育，培养头脑简单的驯服工具，扼杀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文科工作者，最需要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文科班恰恰在这方面予以遏制。文革中姜培良书记真正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这个恶果的滋味。

3. 抑制个性发展，从而抑制了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


4. 严密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严密的思想控制，没可能形成一种自由发展、百花齐放、生

动活泼发展的局面，没有对不同意见、思想的宽容与辩论环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只是一个声音在灌输。

这些，对于 16、7 岁正处于个性及世界观形成期的孩子来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当时又是在那样一个单纯无知的青少年时代，对我们心灵的伤害，性格的压抑，对一生道路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同学语）

这样的对文科人才的思想教育方式，实在应该认真反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1972 年对教育所作的定义“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使受教育者自由生长，人性升华，具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即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自信、个性充分发展、创造力和潜能最大限度得以发挥，从而感受到快乐幸福。这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也应该是我们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

## 【附录】

### 我对姜培良书记的认识

—

第一个问题：带头批判、斗争、最终将姜培良书记虐杀的，为什么是和他最亲近的那些人？

1

文革爆发，最先起来宣战、揭发批判、后来主事时残酷批判斗争姜书记的学生，多是被他特别精心爱护的、包括一些最早的学生党员——红卫兵司令是党员，副司令文革前被誉为“红得透明”，是班里“最红”最受“组织”青睐的，对她文革中的突变，；教师中，

据说最早出来批他、带头高喊“打倒姜培良！”的，也是之前最“根红苗正”、“最得力”、最受他重视的；而最终将他摧残至死的，也基本是他当政时特别着意呵护培养的“红五类”出身者。

卞仲耘（北师大女附中书记）、华瑾（男八中书记）……北京市文革初期死于自己学生皮带棍棒下的中学领导人，基本如此。

为什么？

## 2

这个问题我现在大致想通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姜培良从“党的化身”瞬间变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牛鬼蛇神”。

随着“阶级斗争为纲”在1964年以后的通力有效推行，毛的无限权威与全党全民全心全意的效忠的态势已成定局。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敲响了中国文化教育界（后来蔓延及全国各界）各级领导和所谓“反动权威”的丧钟。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讲话明确说：“只要我们感到他是牛鬼蛇神，我们就要扫他、揪他，在这方面是没什么清规戒律的！”清楚表现出自上而下、挑动青年学生造校领导反的情况。

在姜培良被迫害的过程中，他曾积极推行的“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毋庸置疑发挥了大作用。对于只会“听毛的话”、做毛的“驯服工具”的群氓（不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头脑简单的中学生更甚）而言，毛至高无上，是神；谁“执行资反路线”，谁就是反对伟大领袖，就是敌人就要打倒并“踏上一只脚”！就是那时一个“歌”里唱的：“谁要是反对他（即党中央即毛），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即如我们这些运动初起时的“保皇派”，一旦“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宣布姜培良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造校领导的反”，就即刻放弃了“誓死保卫党支部”的立场。

姜培良在二附中的偶像地位就是这样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

接下来的遭遇，位高至刘少奇，尚遭戕害，遑论姜培良！

3

我们还要思考深层原因。

当初友人的一句话醍醐灌顶：学校应该施行爱的教育，可文革前学校施行的是仇恨教育——跟随全社会的潮流，“阶级斗争为纲”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对待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有同学记得：文科班下乡回来向全校报告收获，其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开会斗争地主的时候，贫下中农气愤得情不自禁上台去痛打地主，贫下中农强烈的阶级感情使我们深受教育。”这是文革前的正面教育。全社会鼓吹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武力消灭，毫不留情。这种仇恨教育，像有人说的，就是狼奶，从根本上侵蚀被教育者的人性，塑造其狼性；这成为文革前的社会意识、行为主导潮流。这种教育，把青年人的积极上进、纯真、热情等优点，混杂着私念、无知甚至残忍等人性的弱点，全都纳入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筐里，变味为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简单狂热，鄙视人情味；越如此越是“政治表现好”“思想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毛的好学生好战士”。

这种教育在二附中的结果就是：一旦文革骤起，被蛊惑以姜为敌——谁蛊惑的，无须赘述；姜培良突然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对毛的“资本主义当权派”，成了革命的敌人！——曾被“阶级斗争为纲”精心喂养的、被后人称为“狼崽子”的，必反转过来咬他。

问题是：为什么成为带头人和主力的不是别人而是本阶级子弟呢？

“阶级斗争为纲”，其基础就是依照政治需要，将社会撕裂为不同的阶级，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而各阶层的子女，就自然成为“自来红”“自来黑”“自来灰”。

文革前受挤压的“出身不好”的，少数内心不满的，文革早期，主观客观都不允许他

斗胆出头揭竿；大部分人则“阶级斗争为纲”观念本身就弱，恨不起来，不可能成为带头人和主力；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非红五类”，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可悲地充当了打手帮凶。

“出身好”的子弟，他对本阶级天然的情感，加之他的首先来自于“出身”的、“人上人”的特殊地位、其所带来的超常的价值感的体验，使他自然而然地“阶级感情强烈”；其中最早发展的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自然更需要“革命责任感强”“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动向嗅觉敏锐”。当然他们中间，由于天性善恶、理性程度的不同，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红五类”中，狼奶喝得越多的，狼性越足。那些最早起来揭批造反的，大多是通过特殊渠道、比普通同学更早更多地了解高层局势，因而更早被蛊惑的。狼性越强的咬得越凶；至于那些打人凶手，在“自来红”的滋养和文革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蛊惑及红卫兵为所欲为的情势中，最凶残的狼性被挥发出来，最终残虐无比以致杀人！

## 二

第二个问题：他自己不是驯服工具，但为什么大力提倡驯服工具论？

### 1

姜培良本人显然不是驯服工具。他有头脑有思想有自己独立见解，善于通过反思得到经验教训。杜平老师说，66年文科班下乡搞半农半读，下乡还坚持学习，她在炕头上认真备课，同学们就着石头桌子上课，去吃饭排着队，去时背诵古文，回来背外语。她认为姜培良非常重视基础知识，他是深刻吸取了58年的教训的。

最突出的例子是王志乐讲的，文革中他整理学校的材料，看到过一个姜培良和高云谈话的记录——姜公然嘲讽毛泽东的学校“课程要减掉三分之一”的内容！他之独立思考、他之不是“党的驯服工具”可见一斑。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提倡“驯服工具”论、为什么那么强调学习《修养》、强调“无条

件服从组织、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什么在二附中尤其是文科班，他就是组织就是党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权威，反对他就是反对组织反对党？

## 2

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首先缘于姜书记个人性格上的自负与强硬，表现在工作中，常常是不允许有另外的声音，形成比较霸气、专横的作风；他的能力强，也使他容易藐视下属甚至同僚，习惯一言堂。这一点，我几乎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其次，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组织管理系统，在给予各单位党的书记以“第一把手”的地位的同时，就把该单位最高权力和无可撼动的权威带给了他，加之姜的强悍的个性与工作作风，自然而然地崇尚权力集中，推崇驯服工具论。

## 3

此外应该还有什么吧？

听来的一件事情使我豁然开朗：老文科班（三届文科班，我依次称为老文科班、文科班、小文科班）某位同学的入团问题，一直不能如姜书记所愿顺利解决，这显然大不利于文科班经验的上传。直至毕业在即，姜书记亲自坐镇，盯着团支部表决，该同学的入团申请才得以通过。

这事使我顿悟。

学长们对人的看法受时代和年龄的限制不一定没有偏颇，而从姜书记之公然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看得出他真急了。

从学长们的文章及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虽然学长们非常热爱姜书记，但老文科班并没有形成集体的、牢固的“组织观念”，没有全面、巩固地树立“绝对服从组织”的班风，没有形成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从而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因此，个性张扬、“自



以为是”、不服从领导甚至顶撞姜书记的情况都有存在。从而在我们班“舆论”（再次说明，我们班的“舆论”，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印象中，老文科班是“乱糟糟的”，甚至有同学感觉他们班是“黑窝”。

老文科班的思想状况，是姜书记绝不能接受、并为之深刻反思的教训，他是一定要为之警戒后届的。

他需要一支积极热情、意志统一、令行禁止的队伍，他的设想计划等才能顺利贯彻推行，才利于文科班早日出成果出经验并直接迅速上传。

我们班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我们班之让老文科班留下来的同学感到“特别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班特别“听党的话”，即姜书记的话，“驯服工具论”在我们班得到高度推崇与全面执行，黑板上大书“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最好的例证。用我们班 XZHW 同学的感受说：我们班推行奴隶主义的结果是：如果上级说你反党，你第一反应不是辩解“为什么说我反党？！我怎么反党了？！”而是——第一念头就是马上检查自己“我为什么会反党？”X 同学因为不服姜书记对他的批判而说了一句“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就被大会小会批评、谈话谈心教育等等各种方式“做工作”，最后不仅低头，口服，而且要心服。我本人在高二后期也得到组织的看重，我觉得和自己“暴露思想”的“透明”并真心实意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大有关系。王学信在老文科班尚且与姜书记公开顶撞、论辩自己的出身，公开以“我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叫板，但在身为北京市文科状元而落第降到我们班后，再不开口，没有成为我们班的“另外的声音”。

两个班的区别，当然和各自多数同学性格有关，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时代因素造成的。老文科班入学，是在 1963 年，“阶级斗争”相对平静和缓，“阶级斗争”意识不是很强；且文科班初办，招生范围不够广，经验不足，很多问题没来得及深入考虑。在这样的氛围下业已形成的班风，不是轻易就可改变的。

我们班是在全国“阶级斗争为纲”调门突起的 1964 年组建的，“政治面目”更“纯正”，

已没有“五类分子”子弟，入学时团员占全班总人数的五分之三，男四中来的6位中5位是团员，而且都是干部（而上一届即老文科班至第一学期末，全班18名女生中还只有4名团员）。初中即已入团的同学，政治觉悟高，理想远大，道德感强，特别严于律己，富于集体主义精神。在这样的主体基础上，姜书记一面狠抓团组织建设，形成严密的多层次的组织构架；一面在思想意识方面狠下功夫，除了经常性的阶级斗争（国际国内、大形势与身边近的等等）教育外，越到后期越大力推行《修养》倡导“驯服工具论”。组织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双管齐下，使我们班呈现出政治热情高涨、高度团结、意志一致、令行禁止的班风。即使有同学有不同想法，自己都会把它消弭或抑制下去，所以我们班个性特强的同学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跟老师、上级更别说姜书记顶撞的事情。

权力集中，形成绝对权威，才能培养这样一支队伍；而“驯服工具”论是权力集中，建立绝对权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恰与时代合拍，与《修养》融合，与“专制集权”的思想体系融为了一体。

### 三

第三个问题。姜书记人很好，但为什么那么积极推行“阶级斗争为纲”、以他为领导的文科班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那么左？

#### 1. “姜书记人挺好的”

“姜书记是不是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争议较大。有同学老师认为姜书记、文科班不左；也有人认为姜书记虽然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但完全是时代原因；也有说姜书记都惨死了还追究什么，等等。

我的看法：每个人，当年所在班级、特别是所处地位处境经历不一样，兴趣个性，思考深度等有差异，感受就会不一样。加之今天的观点、注意点有别，我们只能是：承认差异，自言其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天的时代不同了，看法不一样很正常。

首先我们认为，姜培良书记不仅是好干部，而且他心眼挺好，有时候很显现出人情味，所以他得到了很多师生的爱戴。

听厉益森书记说，1959年姜培良因同情老教师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者”受批判。我了解到，他在二附中安抚并使用了多位或出身不好、或本身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如我们班主任反右时因为给“右派”抄了几行大字报被处分，发到二附中后，姜书记说：“你的处分已经撤销了，档案里不应该再有了，我给你撤出来。”我们班主任为此感激他一辈子。白胜喜老师在姜书记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救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姜书记人挺好的，我得救他。”白老师被冤划右派，到学校后一直不能教书，是姜书记让他给备受重视的文科实验班上课！“他让我上课……”这是白老师直至八十余岁的今天，仍旧念念不忘的。

张圆圆去世前告诉我，当年音乐学院已经内定招我们了（老师告诉了她，但没告诉我，想来是怕我因出身问题录取受阻，这算个组织秘密吧）。虽然过去了近五十年，听了，我心仍旧动荡不已，我想起文革前夕的我，在亮开年轻的歌喉，“人人呐都啊说江南好……”歌声一定很动听……我为自己曾经有过虽然那么短暂但确实那么美好的青春而感动。老师和姜书记向他们推荐介绍了我，抑或给他们看过我的写的东西？如果没有姜书记和老师的关注，推荐，不可能的。

我想起毕业前半年，66年初在李各庄时，姜书记深入我们小组听我们进行“思想革命”（每个小组都有老师深入，我们组是党支部轮流来），同学们依次暴露思想，挖根源谈认识之后，姜书记做总结。他给我们每个人的基本思想状况都概括了一句话，PY是“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LY、ZHFL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是“反正没有我的份儿”。——后来几十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自我认识的加深，我们都在不断感叹：他真会看人，概括得好准啊！——从他来过我们组以后，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处境都变好了——开始受表扬了；后来文革中揭发出，我被党支部确定为第15个发展对象（够遥远的！不过即使在文革中我也为此非常自豪），还有把我留校当团委书记的打算。我想一定是我检讨自己的真诚和挖掘“阶级烙印”的努力、我的热情、当然还有点小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感觉

他让我留校当团委书记的打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有因家庭问题不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我从来没有跟他单独接触过，他却对我厚重如许。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总是心生感动。

在筹办文科班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期间厉益森书记说：姜培良是重表现的，阶级斗争为纲没办法，在那个条件下姜培良还尽量控制，说：“我这文科班，还有家庭出身不好的，表现不错，爱好文学，就吸收过来了。”

写到这里我都不忍心往下写了。

可是我必须咬着牙写下去，为了那个时代、那些荒谬的可怕的事情不再重演。今天追究的，绝不是姜书记个人的责任，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思想路线进行清算，绝不让它再来！这才是今天纪念姜书记的意义所在，才是真正为姜书记洗冤。

## 2. 姜书记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

同时，我认为当年的姜书记执行阶级斗争为纲很积极，文科班思想工作很左。

如本人前鄙文《对文科班思想工作消极面的一点粗浅看法》所谈文科班思想教育的种种：如制度化的强调消极面的“思想革命”、事事“深挖阶级烙印”、严密的思想控制等，显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更加积极、深入、具有文科班独特的形式和内容。

再补充一些内容。

有些具体问题，不用“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无法解释。如：

在林耿耿、缪小放、王凯燕等同学整理的《文科班展板·披头散发稿》中我们看到：1964年9月、教育部林励如副部长听取文科班汇报后的指示讲话，绝大篇幅讲的是数理化外语等课程安排等与文科实验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同时期的文科班工作计划要点等文件，处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与林讲话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孰为左右，一目了然。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些同学的家庭出身往“高”了划？不止一个两个同学。还有的老

师，明明从小被贫农家庭收养，却一定要强调他的生身父母是地主。

班主任给同学的操行评定，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必须旗帜鲜明”，“不能搞‘中间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鲜明”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标准的。及至到文革爆发，我们班的评语还没有改完。

他极善于“见微而知著”，所谓“抓苗头”，上纲上线，达到所谓“防微杜渐”的作用。他在我班亲自主持的几次班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作为普遍问题在班会上进行严肃批评的，多是细微末节，都被他当做阶级斗争动向上纲批判。一次是 Xzhw 同学的杂记本，封皮上写“乱七八糟本”，这“乱七八糟”被他上纲上线狠狠批评；还有 ZHyy 同学的作文，标题《月光静静地泻在那……》，被他以思想感情不健康（小资情调）狠批（对此，我们班主任老师也说“这，他是不会容忍的”）。

大问题好像只有一件：付合良同学因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而思索“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人生哲学命题，古今中外，多少人为此而上下求索。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在二附中文科班，这是个不容思考更不容论辩的问题，付合良不服，姜书记无法说服他，以致当众斥责付合良“神经病！”

附带说明一点：以上这几位挨批的，都是“出身好”的同学，他们做事说话更随意些；“出身不好”的，或者认认真真“和家庭划清界限”、一言一行都在检查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少数人则沉默不语。

~极受学生欢迎的、富有才华的年轻语文教师、复转残废军人靳正宇，文革前姜书记以“我们身边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阶级斗争”为主旨对其组织批判，并且把批判靳正宇的材料拿到文科班学生中，目的是使文科班学生绷紧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这些“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我了解到，原来靳不过就是自恃有才，不拘小节，说话写东西做事都较为随意；旧文人意识强，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而他和学生关系太好，以致学生可以只听他的不听组织的，这应该是关键。而组织批判的契机——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文革后组织作结论：什么事也没有。

当然，当初姜书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对靳正宇的批判竟然导致文革中靳正宇被学生以“大流氓”的罪名活活打死！当然他更想

不到他自己竟然会在同一事件中被学生打死！

### 3. 阶级斗争为纲的哈哈镜效应

姜书记在日常工作中设置了种种假想敌，绷紧了我们的神经，时时警惕着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资产阶级。他的“抓阶级斗争苗头”的思想教育方式，经过阶级斗争为纲的哈哈镜，映射到学生和个别青年教师简单冲动（不可否认其中也间杂些个人功利目的）的头脑中，则扭曲扩张成简单粗暴、无限上纲。

在对靳正宇进行批判时，有人对靳穷追猛打，攻击得异常凶狠，搞得在场的老师们都想：你们同班同学呀，干嘛这么狠哪！而经过哈哈镜效应，我们班常常表现出特别的“左”。

HYM同学看《舞台姐妹》掉眼泪，被认为是“反动阶级本性的大暴露”，在同学中几乎成为“坚持反动立场”的代表，有同学跟她学唱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的《沙家浜》，就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高级知识分子家长，被分析为“知识资本家”；中农出身，就一定是“自私自利，怕革命”；“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大帽子随时都会扣到单纯的同学头上；以致带点咸菜吃个枣、梳梳头看个花展都被列为资产阶级思想，“思想革命”时被穷追猛打，几次过不了关……

及至文革，这种简单粗暴、无限上纲，演变为暴行，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就变成实打实的凌辱、施暴、流血、丧心病狂地杀人。姜书记本人、靳老师都被红卫兵虐杀。其他受害人无法计算。

和第一个问题源于同根：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狼奶，以其为教育之纲即推行仇恨教育，从根本上塑造被教育者的狼性。文革前后一脉相承，只不过文革发展到了极致，到姜书记本人被咬啮时，残虐无比！

#### 4. 追根溯源

文科班的“思想革命”还是给了我一些有益的东西，其一就是学会凡事深究根源的思考方式。我在思考姜书记推行奴隶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纲时，归纳出了几个原因。

首先是，姜书记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一个有能力的干部，想干事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潮流中，不积极执行这个纲，不会有出路。

无论在我亲身经历还是今天看到的纪念文科班的材料中，都感受到了他的急切。他太想干事业，太想干出成绩来了！由国务院、中宣部—教育部—北师大直贯给二附筹办文科班的任务，实在是太难能可贵的机缘，他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干出成绩来——教学中创出独特的经验，开门办学创出路子，思想教育也必须创造经验出成果！如此，则必须紧跟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势，以姜培良的苦干精神、创新能力、发挥能力，他在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时也确实干出了成绩，创造了经验。从李各庄回来，名义上是要准备高考，但实际上我们没怎么进行备考，班里舆论和我们心里，备考就是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回京后，我们多次到教育部、中宣部汇报，在西城文化馆汇报演出，宣传我们开门办学的经验。从中能看出上级乃至中央宣传及文教部门的二附中文科班经验的重视，更能明显感受到他盼望得到上级乃至中央文教部门肯定的急切。

这一点非常重要：赶上难得的干事业的好机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思想，急切的立功心无可指责，但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越是有干劲、有能力的干部，越想干出成绩，当然就越是需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方针，当然就越左。

这也就回答了他是一个好人好干部，但文革前，他为什么那么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文科班为什么那么左的问题。

其次，时代思潮总是与个人的思想、秉性、经历相结合的，才能发挥作用的。我觉得姜培良的积极执行阶级斗争为纲也是其无法与自己的历史剥离的结果。我们看不到他的档案，

只有几个点我们知道：他出身贫农，14岁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在部队里长大，解放后在小学校长任上被保送上大学。当年在部队，这个小初中生办板报，起个名字“杂货铺”，受到上级严厉批评。在我们班思想革命动员会上批判“乱七八糟本”时，他曾亲口给我们讲他的这段挨批史，敦促我们引以为戒，摒弃小资劣根性，时时刻刻严正态度，时时事事与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保持一致。他挨批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他对“小资”意识的坚决彻底批判精神，也应该始于斯吧？出身经历简单，青少年时期所受教育有一定局限性，这是我个人对他前期思想经历的感觉。


解放后他被保送北师大，后留校做党的工作。听说反右时师大教育系挺左的，打了很多右派，没有听到时任副书记的姜培良不同的声音，只听说他和书记关系挺好的。58年大跃进时期，他在良乡搞“共产主义教育实验区”（教育系有老教师说，这个实验就是书记搞的由他来实施），把农村孩子集中起来，住宿、吃饭、劳动、学习，过共产主义，孩子们很高兴，家长们却因为要给孩子分口粮用项而多有微词。这“共产主义”会不会是超越当时社会条件的教育“乌托邦”？而到了1959年，我们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姜培良被划右倾，原因是同情老教师。有同学说，姜书记59年所谓“犯右倾错误”，是良心发现，是对57年打右派积极的反省。但是，一旦你良心发现了，你就“右”了，就被从大学下放到中学来了。同时从师大下到二附中来的十几位老师，绝大多数是和“右”有关系的：右倾、给右派抄过几行大字报的，给右派当过助教的，历史上有点“问题”的，“出身不好的”，至少也是“不问政治”“不积极要求进步”，大概还有个别“不听话”的。也有教育系老教师说，他被下到二附中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和上级没搞好关系被排挤来的。被划“右倾”的经历，应该使他切身体会到对“右”的畏惧。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岂能不记取？！几十年“宁左勿右”的历史展示给人们：左，哪怕犯了错误，也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姜培良的经历使我看到，在“宁左勿右”的传统和现实挤压下，一个勤奋正派，心眼不错，有点专横、思想方法上有点绝对，又极想舒展大志的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带着镣铐跳舞”，如何在左突右



奔中不由自主趋向“左”的。

姜培良书记开创文科实验班，他强调基础知识的教学经验，他开门办学的某些积极因素，都给后人留下巨大的财富。而他积极执行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最终那条纲在文革中发展到了极致，如同发了疯的狗，他被疯狗吞噬了。

我为姜培良书记哭！

### 【本刊声明】

##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 方惜辰

本期封面： 鄒 行